



編者的話：

「馬克思主義在香港」這個專輯，是一個不算成熟及完整的嘗試，但我們相信，這個題目是理解香港近四十年政治及社會思想的重要線索之一，尤其是在近年就著「本土」與「左翼」有許多批評及爭議，追源溯始更顯重要。

我們選擇了非官方馬克思主義在七十年代作為起點，有三個原因。首先，七十年代一般被視為香港本土社會形成的初期；第二，今天香港不少文化及政治現象也可追溯至這段時期，例如當時出現的青年激進運動、學運火紅年代等等；最後一點，從國際及區域角度看，非官方馬克思主義在香港的發展，也標誌了後冷戰時期的思想狀態。我們看到一群知識青年，在共產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西方世界之間，發展出自己的思想空間與社會實踐。

七十年代非官方馬克思主義在香港的發展，可以有多個不同的主題，我們這次因為時間關係，無法匯集成一個更完整的主題，但幾篇文章之間也有一定的相關與對話。我們特別感謝區龍宇及劉榮錦兩位花了大量時間接受我們的訪談，他們的口述歷史讓讀者可以窺探一下1970年代香港年青人接觸社會主義者的氛圍，特別是他們與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這亦是香港左翼思想構成的一個重要面向。區龍宇由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青年社」，到後來的「新苗／先驅社」，至近年參與「左翼廿一」，他的出版及著作不斷，顯示出他在香港的持久思想影響力。劉榮錦也是同一時期的社會主義者，與多個陣營派別有複雜的關係，屬自由共產主義者（libertarian communist），他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是「四五行動」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兩位除了縷述過去，亦對當下香港有不少評議。由於劉榮錦在口述中涉及一些對「新苗／先驅社」的批評，所以，我們再邀請了區龍宇作了簡短的回應。

在訪談期間，我們注意到七十年代曾有逃港紅衛兵在香港出版少量文字，也與當時的進步本地青年有一些互動。當中以虞雪的〈理性的黃昏〉可以說是理論代表作，直至1980年代仍然有不少香港左翼知識青年閱讀，近二十年卻又幾乎被徹底遺忘；所以，葉蔭聰撰寫了一篇文章，介紹了這篇文章大致內容，以及討論它在本地左翼政治及社會思想上的重要性及位置。

這個專輯的三篇文章，各自也有許多值得研究及發掘的材料，期望日後有機會能再進一步跟大家介紹。若有讀者有相關資料或高見，也歡迎大家提供給《思想香港》甚至賜稿。

葉蔭聰

目錄

出版與思想探索：社會主義青年社·新苗/先驅（區龍宇）	3
第一部份：解放馬克思主義者·四五行動·929事件（劉榮錦）	15
第二部份：新機場事件·香港回歸·離開運動（劉榮錦）	35
關於劉榮錦先生訪問稿的幾點澄清（區龍宇）	57
人民的社會主義：初探《理性的黃昏》（葉蔭聰）	59
今期供稿人簡介	64

出版與思想探索：社會主義青年社·新苗/先驅（區龍宇）

【標題為編輯所加】

受訪者：區龍宇

訪問者：葉蔭聰、劉麗凝

訪問整理：劉麗凝

(葉：這一期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在香港」。)

劉再復（編按：李澤厚）有一本書叫《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如果按他的理解，馬克思主義真的很弊。

(葉：我們可以先從個人出發，然後再從過去看香港馬克思主義。首先你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接觸左翼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呢？)

我的接觸就是因為保釣運動，最近我寫了篇文章，遲點會在「獨立媒體」投稿，題目為《為甚麼我不再保釣？》我是從71年的保釣開始，但從2000年，甚至到更早，我們不應該再去保釣，至少民間的保釣是不應該再做下去，否則助長了中國作為次帝國主義國家（sub-imperialist state）的霸權主義。或者有人說中國已經是帝國主義，總而言之，無論是sub-imperialist或是imperialist，根本都是霸權國家了。

71年的時候我在讀中二（14歲左右），我是透過學聯的中學生組參加保釣。當時我太年輕，對於開始發生的思想論爭不很了解。直到中五(即是73、74年)我才實際接觸《70年代雙週刊》(下稱：《70》)的成員，之前已經讀過他們的雜誌。當時我上門找他們的，我去到的《70》時候，吳仲賢已經走了，我就跟隨其他成員四處玩了一年，也幫忙了一點點《70》的工作。

《70》的出現令人耳目一新，我們很多人都受這雜誌的影響。他們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也是一種社會主義，但最初不是很政治化，反而是著重文化上，或是社會上的批判。

《70》是當時唯一出現的左翼，而且又在運動裡面，不過當時左翼的影響非常微弱。如果政府不鎮壓(保釣)運動，那麼未必會那麼快就出現更多的青年運動，《70》也不會那麼快出名。最初《70》的人其實不是太政治化，保釣之後，很多人被打醒了，但兩岸政府完全不理保釣運動，所以香港的運動很快就進入瓶頸，大家開始覺得要尋找出路。72、73年大家都很苦悶，都不知道到底應該如何搞下去？這種苦悶的情況促使大家出現分化，一部份人想更

正視香港本身的社會問題，所以慢慢地從保釣運動分出一部份人，他們探討社會問題，例如發起和參與73年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由73年開始，《70》裡面有一部份人轉為托派，有些也是受第四國際影響的。吳仲賢最先離開《70》，轉為搞《戰訊》，後來才有革馬盟；但有些人是不想出來，想仍然留在《70》裡。

我是74年中學畢業前後接觸《70》的朋友，後來再參加「社會主義青年社」，這個組織出版《新思潮》。社會主義青年社是受《十月評論》的影響，即是老一輩托派，所以我大概知道早期的革馬盟的歷史，但不會太準確。我加入革馬盟是1978年，那時所有青年托派都要統一，因為不想老一輩的托派「阻住晒」。

(葉：革馬盟是不是第四國際的正式支部？)

革馬盟不是第四國際正式的支部，《十評》才是。但因為當時有一批香港人前往法國，向1968年革命朝聖，成為一種潮流，去了法國就成為托派；當時的《十評》是地下的，而且地下了數十年。這也是難得的，因為托派在1952年國內都被全抓了，香港由50年代起英國政府也驅逐了不下十個本地的托派，有些人去了澳門或台灣，所以他們受的打擊太大，所以只能地下。但到了70年代，其實不應再地下了，但他們仍然保持地下，年輕托派就覺得很傻。雖然《十評》是第四國際正式的支部，基本上都是完全自主，不同於現在一些國際組織，由中央控制(英國的組織)。巴黎第四國際的傳統從來都不是這樣。所以《十評》的方針是自己制定。但由巴黎回來的青年覺得無法與處於地下的《十評》合作，《十評》也怕你會連累它，所以年青托派在法國同志的支持下就出來搞革馬盟，淵源就是這樣。

(葉：你中學畢業後一直跟左翼團體、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團體越來越緊密，從你個人的經歷上，其實有沒有特別的原因？例如最初參與保釣運動的人不一定有左翼思想，你回看自己的經歷，為何思想上會有這個轉向？)

其實是跟現在「90後」這一代開始不要中國人的身份，心理是相似的。我們那一代人都是「無根的一代」，是我們那一代共同的心理特徵，上一代是完全不理解的；正如目前很多人不了解80後、90後，主流的泛民也不了解。其實他們應該理解，但可能人年紀大了就開始退化，不久前有一位主流泛民，都是70年代出來，但是他就對後生一代雖不是批判，但就是不滿意學民思潮，但他們忘記了當初他們那一代出來時，共同心理是對香港和對中國都缺乏歸屬感，因為保釣被港英政府打壓，但當時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政府，都不支持保釣。那個時候的鎮壓尚算溫和，但不准許我們派傳單，警察可以拘捕你，而且荒謬的是派英文傳單是合法的，但派中文傳單，就必須獲得批准，所以當時大家有種民族感情在裡頭，覺得要反殖。但中共和國民黨都不支持港人反殖。

參與保釣後會發現，台灣政府不理你，中國政府不理你，當時《文匯報》是如何報導評論保釣運動的學生呢？它批評學生，要不是「別有用心」，就是被人利用，又說保釣與否是我們國家的事，我們國家自然會去處理，你要相信人民相信黨。就是用這種語氣。正如後來白樺所說：「你愛中國，但中國愛不愛你？」我們那一代存在一種共同的憂鬱，我們是無根的一代，我們不是英國人，我們只是臣民；大家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中國不會理你，所以這種身份的迷惘其實是相當苦惱的，我想我們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現在的學民思潮的學生。他們心裡有很大的焦慮感，是我們大部份成年人，特別是四十歲以上的中產人士是無法理解的。但當年如果不是曾經參與過保釣，你是不會了解，你愛國，但政府不愛國，而且完全不理睬你。這些知識是課堂學不到的，是必須自己走出來抗議才會明白。當你走出去的時候，你會體驗到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這種感覺與經驗，也適用於今天佔中的青年人。

七十年代的大學開始出現很多社會服務團，他們沒有左翼思想，只是一種同情心，組織訪貧問苦，後來國粹派也大搞訪貧問苦。我記得我去過銅鑼灣避風塘，或是去公共屋村，你會有很深的印象，因為雖然我是貧窮人家，但我不是住公共屋村。我第一次(當時我仍是中學生)去公共屋村就是訪貧問苦，直到今天我仍印象深刻。公屋七層天呢！我們一直行過去，見到那些小孩爬在地上，皮膚長滿了癬，都是沒有人理會的，這些小孩滿街都是，全身都很髒。當時我住在旺角，我從來是沒有見過這些景象，所以這種社會的現實讓你反省。後來我中學畢業後在一間英國大行工作，做messenger的工作，有個好處是經常去大老闆的淺水灣的大洋房，那種貧富的差距是很難想像的，這些都是社會的現實，是很令人震驚的。記得74年有一次聚舊，有幾個美國留學後回港的朋友見到我，就問：「為甚麼你整個人不同了？」其實這是學習的過程。

(葉：剛才你說你那一代人有一種無根的感覺。我見到很多時候也有人用這個字眼，但同一時間又是七十年代初出現了國粹，特別是比較多在大專裡出現。)

中學也有的，因為保釣的關係，即使是中學生組後來不再有甚麼活動，但人脈關係仍然存在，例如有人讀完師範後去教書，這些都在滲透，所以是擴張得很快。我想國粹派都是在73年才正式的出現，有跡象顯示崔綺雲是發起人，但是無法去證明，因為當時他們經常出入新華社，關係非常密切。國粹派搞「中國週」都有不少中學生前往參觀，甚至包括我一些同學，他們在念大學，在中國週擔任導賞員。

(劉：是否因為左派學校動員才会有這麼多中學生前往參觀「中國週」？)

不是的。不要看輕當時的情況，因為當時的確有一種民族感情在裡面，然後八十年代再出現，例如「龍的傳人」等。當中國有些微希望的時候，中國人的感情就會出來，所以八十年代不是偶然，雖然很短命，也應該短命。但七十年代的民族感情的確是存在，因為你是受英國殖

民的統治，除非你是高等華人，否則你會感到不順氣。因此不少年青人參加中國周，不是因為來自左派的系統，而是出於民族感情，或是抽象一點來說是「公義」而成為國粹派。

最初我都是出於民族感情，但很快我的目光便轉向貧富懸殊的社會。當然當時我不太懂怎樣說出來，但後來我就明白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每一個民族自己都分裂成兩個民族：富人一個民族，窮人一個民族，富人是" Gods of Olympia"（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窮人在一切方面，不只是經濟差異，精神面貌文化品味已經完全是兩個世界、兩種語言。我出身不是富人，而又經過運動，我就認識了這個社會，你的視線自然就會轉過去，當時我是完全不自覺的。我記得當時爸爸給我一部照相機，我出於自發，專登去拍乞丐，我當時解釋不了，但後來知道，是因為覺得社會很有問題。不要忘記直到1971年香港才有小學免費教育，之前我們全都要自己交學費的，社會貧窮的情況是令你很忿怒的。沒錯我們中國人是被欺負，但高等華人有被欺負嗎？完全沒有。他們跟殖民地政府生活得非常開心，所以就會很想找到解釋為何社會出現貧富差距的問題。

(葉：你加入革馬盟後，主要是從事甚麼類型的工作？)

在加入革馬盟之前，我是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社。社會主義青年社由74年開始（我76年才加入），最初的時候是用另一個名稱，後來78年整個社會主義青年社的人都加入了革馬盟。原因大家都是年輕人。但《十評》還是地下，到底大家可以去哪裡開會呢？因為是地下組織，他們當時是去紅梅谷開會。當然我很尊重他們，他們受到如此的打擊仍然堅持是很難得，而且你不清楚到底甚麼時候會輪到你，因為政府可以隨時將你遞解出境，那時誰會講法律、相信法律的人就是傻的，所以他們的工作是相當困難；但這就使他們很難與青年合作，後來幾乎所有年青的都離開十評，加入革馬盟。

革馬盟主要是由《戰訊》及社會主義青年社兩批人組合而成。托派要搞組織，但無政府主義是不想有組織，長期合作就變得很困難，所以沒有《70》的人加入革馬盟，《70》就保持無組織的刊物的狀態，到78年都不正常化了。

革馬盟在1974年成立，四年後我才加入革馬盟。我最初都沒有計劃自己的角色，都是順其自然，結果以寫作為主。78年主要是我去編輯《新思潮》(以社會主義青年社的名義出版)，《新思潮》的前身是《左岸》。雖然革馬盟統一了，但仍然搞兩份刊物，《新思潮》是針對更年輕的中學生；《戰訊》是成熟一點的，會站得比較前，是有風險的，你就考慮承受能力。我們就做中學生的工作。

雖然加入了革馬盟，但我跟吳仲賢他們年紀相差了幾年，以前你在一個運動高漲的情形下，三年已經是一代人，正如現在一樣。我是屬於年輕一點的那一批。80年我與幾位朋友被革馬盟開除（因為搞學習班），但我們離開後不久，他們從81年開始不再出刊物，而且發生了吳

仲賢被捕事件，之後革馬盟基本上瓦解了。吳仲賢因支援內地民運人士而被捕，後來中共把吳仲賢放回來，但要他做臥底，他表面上答應，心裡當然是不肯。吳仲賢回港後向組織交待了來龍去脈，但第四國際覺得吳仲賢答應了(中共)也是不對的，所以這一役加速了他們的瓦解。

(葉：你們為甚麼被革馬盟開除？)

因為路線上有分歧，而且這個分歧大家未有好好討論。簡單來說，就是對形勢估計和對策的分歧。從60年代(特別是古巴革命)全世界青年的激進化運動，全部的托派、外國的毛派(中國那些不計)，包括無政府主義，所有的左派都在期待一件事：就是青年的激進化運動會刺激起龐大的工人全面的反抗，每個人都期待這件事發生。所以第四國際1979年大會就通過一個決議，說雖然60年代起有很大的發展，但主要是學生為主。所以我們一定要轉移重心到產業，鼓勵黨員、左翼的成員，去進入工廠，紮根工人，當時吳仲賢、李懷明都贊成，所以他們全力推行這件事。劉子廉本來在教書，但就辭職走去地鐵工作，後來地鐵工潮他也有參與；多數人都贊成這樣做。但我的懷疑是，香港策略上是不是也要跟隨呢？我覺得還未到時候。

當時我不同意這個做法，也認為當時大家的理論根基也很薄弱，即使你有工運高漲，以此理論裝備，也很難影響很多人，因為理論不行，策略也不行。當然我對世界形勢不是太清楚，我只是比較了解香港。但後來了解到，79年之後，世界左翼其實是全面走下坡，就是Long Down Turn，以及新自由主義全面的勝利；香港也是完全走下坡，你看看從70年代至80年代罷工的數字就知道。同時，香港的資本主義更加起飛，再加上殖民地政府的打擊。港英政府從鄧小平上台後，就改變政策了。76年發生天安門事件，托派與無政府派(《70》)在維園合搞了一個聲援行動，港英政府竟然批准。但79年當中英友好又再確立後，就不再批准我們搞集會。我們堅持要搞，港英政府就拘捕我們，拉了三個人坐牢。所以殖民地政府加上共產黨的雙重打擊，革馬盟慢慢散檔。直到1988年，一些前革馬盟的人，才再組織四五行動，但嚴格來說已不是社會主義團體(Socialist Organization)，所以已變了模樣。外面的打擊，加上自己理論根底不足，錯估形勢，組織就瓦解了。

(葉：1980年你離開革馬盟後，就開始搞《先驅》、《新苗》？)

是的，成員主要是由革馬盟出來的人及《新思潮》的年青人。先驅社直到現在仍然存在，沒有瓦解，只是年紀大了，已沒有太多行動能力，更沒有甚麼影響力了。

離開革馬盟之後，除了出版刊物之外，我們都著重行動：例如我們都很積極地參與中英談判時期的回歸辯論，1983年我們是左翼的回歸派，主張一定要在香港爭取自決(當然沒有人理會)。86年積極參加反核，親歷張文光講，「中央決定了，大亞灣核電廠一定會興建」，於是

鳴金收兵；88年直選我們要求爭取全面普選，但他們只爭取一半直選，我們盡量求同存異，希望加入他們的「民促會」，但他們不准。黃偉雄(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當時也出來講：「你們（民促進會）爭取至少一半直選，與他們要求全面直選，也非根本對立，怎可能不讓人加入呢？」

當時作為一個托派組織，或者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團體，是要面對全面的排擠，就算支聯會讓你加入，他們都用很多方法來不讓你發言。王凡西講過：「很多人都是在無權的時候就要民主，有權的時候就要紀律、集中」，支聯會/泛民更是這樣。支聯會每次集會都有幾十萬人參與，但他完全不會讓你派傳單，至少最初是這樣。為何會這樣？你可以理解的，那就是他們的路線不同。張家敏公開地講過：『一定不可以和托派一起，這樣就跟中共「無偈傾」』，讓托派加入就會跟中共「無偈傾」，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為求與中共「有偈傾」，就要排斥路線不同的托派。

現在我們都知道，司徒華在整個80年代，其實跟共產黨保持藕斷絲連的關係，所以對托派排斥得如此徹底。不過，有一點我要講的，就是70年代年輕托派，的確有時會犯一點極左錯誤。立場與綱領無論怎樣好，策略仍然需要講究的，但這方面他們得不到真傳。例如78年的「金禧事件」，革馬盟做了一件錯事，就是他們認為金禧爭取到復校並不是勝利，他們認為這是失敗，但我覺得這是錯的。雖然金禧師生爭取不到原校復校，但畢竟爭取到復校，避免了老師被開除，學生無書讀的狀況。任何社會運動和鬥爭，你不令統治者痛一下，你不會爭取任何東西，但你一令他們痛，他可能會做少少讓步，但同時也會對付你，這是活生生、力的鬥爭，所以社會運動不會那麼輕易大獲全勝。就如罷工，有多少罷工是可以全面勝利的？多數都是局部勝利。你只能夠盡力贏，但不能說沒有大獲全勝就是輸。

你可以講這是革馬盟不成熟的地方。他們畢竟年輕。這也是很正常，你要從實際運動中學習，但這往往會成為別人的藉口，不跟我們合作。不過，我那時所屬於的社會主義青年社，那時還未與革馬盟統一，社青社的立場就跟他們不同，我們覺得應該要承認勝利，縱然那是局部的。

(葉：89年之前你們都遇到幾件事，例如香港的前途問題、反核、89對你們有甚麼影響呢？)

當然很大，雖然我們不是真正很意外，因為由88年已經開始看到，大陸有人開始敢言，而那是源自86年的學生運動。大陸新一代，以86年的學生運動為例，就已經是改變中，當然沒預計到會如此高漲。八九民運最後結果變成這樣，然後帶動整個蘇聯的崩潰，即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對左翼既是一個解放，又是一個打擊，但首先是打擊。我記得很清楚，89年六四之後，東德發生巨大群眾運動，我們有一個成員，他是大學生，他打電話告訴我：「我

覺得我們完全錯了，你看蘇聯崩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徹底失敗了。」我說：「我們之前都討論過，這些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是官僚社會主義，官僚從長遠來說壟斷政權就是為了發財，所以恢復資本主義是必然的，這根本不代表社會主義的崩潰。」最後那個成員還是退出了，你就知道雖然斯大林主義並不是真的社會主義，但它卻打著這個名義做了許多壞事，然後，你試想想蘇聯這個地球佔六份之一領土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竟然會變得如此「化學」，一下子崩潰？這怎會不造成左翼運動失去信譽？總之，蘇聯陣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它的崩潰，卻帶來全球性的右轉。不過嚴格來說，其實從80年代世界已經開始右轉，而起點就在文革及赤東，這是使社會主義失去吸引力的起點，因為大家都會質疑，號稱社會主義的政黨，竟然會做出那些事情，然後89至91是致命的一擊，所以真正的左翼要使人加入及理會就變得更困難了。

(葉：其實我一直搞不清《新苗》、《先驅》這兩個名，到底是先有《先驅》還是《新苗》?)

次序上最初是叫《新苗社》，後來才叫《先驅》(94年左右)，應該是頒布基本法之後才叫《先驅》。不過成員人數不多，高峰都是十五人以下，通常都是學生或知識青年。八十年代初革馬盟開始瓦解，四五行動於88年才成立，期間剩下的托派組織或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就只餘新苗社及十評。

我們是有參加行動，但主要的都是思想的探索，通過刊物以文會友，一起探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勞工運動，雖然1925-1927是很光輝，但後來也失敗得很慘，史太林斷送得太慘。1949年根本是農民革命，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工人階級革命，但不管怎樣，中國沒有工人運動，那麼馬克思主義也就很難有個土壤，皮之不全，毛將焉附啊？共產黨根本不會有幾多馬克思主義的。所以表面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將近有一百年的歷史，但是真正的歷史是很短，我說的是原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即源自西方的、開放的、自由的馬克思主義。在大陸，「自由」兩字竟然成為一個“dirty word”，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總之，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沒有在中國生過根，時間太短。我理解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教條，而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幫助我們了解真實社會，所以馬克思主義不應該是封閉的。但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沒有生過根，所以我們這班人覺得一定要在這方面做多點研究、探索和學習，不管有沒有影響。

可是左翼思想已經斷了代。不過也不要緊，Life will find their own way(生命自會尋找自己的道路)。我們做的東西沒有太大的影響，但至少對我們這批人，雖然有些因為上有高堂、下有子女，而不能不淡出，都仍然沒有散檔，因為仍然可以自得其樂，而且回看過去，比照眼前，仍可看到，我們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工具，丟失它是很浪費的，而在研習過程中我亦學到很多東西。

(葉：思想上有沒有出現過變化？例如80年代開始的時候，你們都強調思想性的探索，我了解不少左翼的團體，它們思想上的探索會涉及政治上的爭論，往往在思想上有批判的對象，或是要處理的問題。80年代要處理、面對、批判的對象，跟後來有沒有不同呢？我試講一些印象，但不肯定對不對，例如我在80年代尾開始讀《新苗》，當時你們會對選舉的問題批評民主派，對選舉、對民主的看法，我印象中你們當時要對民主派有一種批判。當然對中國的批評和反對是很清晰的，但是香港特有的狀況下，你們都有不少的對香港的民主派的批評。)

批判當然是，因為幾個層次，最基本的層次是泛民的自由主義派，特別是港式的自由主義，基本上可以說是自滿的中產，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好像人人都受惠，但其實90年代開始，當香港的產業空洞化，香港的製造業曾經佔40%的勞動人口，然後由短短十年間由40%跌到不足10%，目前更只剩下3-4%，其實大批製造業人口失業，大批downward mobility（向下的社會流動），本來是車衣女工，都變成清潔女工。

泛民有沒有社會政策來針對產業結構改變所帶來的就業問題呢？只有一樣，就是主張再培訓。但再培訓後做甚麼？洗碗、清潔。我現在的清潔鐘點都參加過再培訓，她以前就是車衣女工。這是泛民的failure（失敗）。我想我們在二、三十年前指出過，如果你不理那班貧窮的人，他們將來可能有一部份會變成建制派的群眾基礎，當他們貧窮到極點的時候，他們的一票就變得值錢，會出現買票買票。而且有時不是出於買賣需要，而是一個心理的問題，蛇齋餅粽當然是有物質的一面，但重要是因為你關心我，你送餅給我，我當然投票給你。

香港的泛民，就是港式的自由主義，是等如沒進化的自由主義，港式的自由主義完全忽略貧窮失業的問題，對於這個重大的產業結構重整（restructuring），台灣都會有人搞「反關廠連線」，現在仍然存在。香港甚麼都沒有，只去說服政府搞再培訓，這個失敗是民主派的失敗。所以我覺得我們當時針對這一點是對的，主張政府應該要帶頭創造就業機會和介入。自由貿易、自由放任都是騙人的當時提出這些是沒有人會聽的，但泛民過去的忽略，現在就看到目前的結果。

第二是政治層次上上的。泛民接受循序漸進實現普選，以為共產黨真的會逐步給你，但那是全錯的。我們在80年代已經不斷批判循序漸進論。如果連作為很起碼的普選要求，都不力爭，那麼更高一點的民運自主，憲制改革，重寫基本法等等，就更不用說了。泛民看不到的東西就是，中共本質問題，它無論從政治上、經濟利益上都必須控制住香港，而民主派是看不到這件事，還以為中共會妥協。

托派能看得深一點亦都因為過去有慘痛的經驗，也可以說是我們對史太林主義的理解。1949年當共產黨勝利的時候，當時所有的民主黨派全興高采烈地上了賊船，大家看看章詒

和的《最後的貴族》就知道。當時中國的托派，在共產黨勝利的時候，卻決定了應變措施，凡是在中國大陸露過面的就流亡香港，凡是在香港未曾露過面就回到大陸進行地下工作，為何呢？因為知道中共一定會逐步消滅政治自由，根本不相信中共的承諾。所以當時王凡西會出來香港，而鄭超麟就留下，這是大家商量好的，鄭超麟是領頭人物，所以不能走，道義上不可以，一定要留下，結果被拘捕被關押27年。王凡西走到香港，後來被港英政府發現，遞解出境至澳門，1973年再流亡英國。因為香港和澳門都是不安全的，共產黨派人上門跟王凡西說，我們要你何時回來就回來，暗示可以綁架他回國，而澳門政府不會理會。

當時托派為甚麼會做這個決定？是因為托派知道，中共所有講民主的東西都是假的，因為它的專制本質是不能更改的。泛民覺得中共是可以慢慢改良，其實錯了。不過老實說我希望是我們錯，我希望他們成功。我希望爭取民主，真是那麼容易。可惜不是。

(葉：你說《新苗》不是一個很大的團體，甚至覺得沒有影響力，其實當中會不會有變化？)

就是不斷變老，越來越老。自己要知道甚麼時候要退出舞台，見好就收，當然不是收檔。《新苗》在六年前開始沒有再出版了解，這不是錢的問題，反而是因為沒有人寫文。既然有年輕一代，就讓他們慢慢摸索。我都參加左翼廿一，它的成立我也有參與，雖然都不算積極，也是支持一下，但終歸要靠年輕一代了。在1999到2005年間，我們與一些反全球化的團體很積極參與全球正義運動，反對財團的全球化，但現在比較少參與了。

我們特別關注中國勞權，這是我們自覺的決定。以我個人為例，我自己都有參與全球化監察，十多年前也有搞聲援中國勞工的運動，不過現在沒有了。但當時我覺得我們要在華語世界復興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統，不能只關注香港，也需要關注中國，而所謂關注，不能限於理論，更需要實際的了解。中國變化的影響是世界性的，所以在回歸後，大家討論後，覺得要走入中國的基層，去了解實際的情況。中國走資本主義是最大的壞事，但唯一的好事，是中共也不能不就社會控制上鬆動一點，可以有空間讓我們到基層了解情況。你不能只按照媒體上的報導去了解中國。中國很多東西都可以私有化，但傳媒一定不會私有化，因為中共要控制思想，結果，你了解中國，只依靠傳媒是不可能的。也不能光靠學者，因為你知道，在中國如果沒有政府的允許，是不能做社會調查的，否則就是非法的。當然即使是非法但仍然有人做，但總之，你想去了解真實的中國是很不容易的。何況我們不是學院中人，沒有學術渠道，所以我當時認為，一定要做中國的勞工工作，不是因為以為可以發起一個工人運動，那是沒有可能的，而是要自己親身去觀察，從中去了解真實的情況。我們在80年代，可以光憑文獻研究去判斷，指出中國正在恢復資本主義，但要判斷中國勞工的狀況，他們的思想與心理，就要對真實的中國多一點實地了解。這對我們了解現時中國崛起的問題，也很重要。

(葉：回歸後，其實不只是香港，全球的左翼思想開始復興，例如香港以前不會有人以左翼之名去搞一個組織(如：左翼廿一，中大的左翼學會)，這一類組織雖然不是托派或是革命馬克思主義，但是它是一個比較廣義的，你會怎樣評價他們，以及與你們過去有何關係？)

其實托派作為一個名稱，就歷史來說已成過去，這已經不是一個political valid（政治上有效）的名詞，而是historical valid（歷史意義上仍然有效）的名詞。我覺得托洛斯基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而且是一個實踐家，他有歷史的遠見。他補充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裡一個不足的地方，就是現代官僚理論。馬克思主義有點歐洲中心主義。傳統西方社會學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往往視官僚和國家機器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當然馬克思也承認國家機器有某個程度的自主性（autonomy）但這個自主性是相對的。我覺得基本上這個是對的，但不夠精細。托洛茨基的貢獻，就是指出，根據蘇聯的經驗，在特定情況下，國家機器以及官僚，不僅自主，而且將所有階級都置於控制之下，甚至消滅。另一方面，雖然它有很大的獨立，但最後來說都是相對的，最後它仍要從私有財產中找回權力基礎，所以它的歷史趨勢，就是恢復私有制，事後證明他的預言是正確的。托洛斯基的理論分析，補充了這個空白。

托派作為一個名稱，根本不是自稱的，而是史太林叫的，只有毛澤東才會自己叫「毛澤東思想」，這亦是中國的特色。XX主義，往往都是別人稱呼的，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托洛斯基主義.....托派這個名稱，一直到冷戰時候，政治上還是valid的，但冷戰結束後，蘇聯恢復了資本主義，你可以說一切回到原點，全世界都實行資本主義，這種情況下托派這個政治名詞，已經失效了，成為歷史了。它的綱領和思想遺產，自然對今後的社會運動有巨大參考價值。但這些遺產，需要根據已經大大改變了的現狀，來靈活運用。

左翼青年的出現，是一個好的現象，代表新的一代，就像我年輕的時候那樣，他們發現社會原來已經爛成這樣，才會驚醒，自然就會左傾。最重要是有人出來反抗這種壟斷資本主義。當然路是很漫長，而且一出來必然受到攻擊。現在中共最恨的就是左翼，最恨的是你想喚起低下階層及社會運動，尤其來自下面的反抗，所以左翼要做好心理準備，會面臨中共的打擊。不過現在有一個好處，就是共產黨太反動，已經成為人民公敵，連泛民都無法回頭。

(葉：過去若干年出現了一種全球的左翼思想復興，但同一時間，特別在香港開始有一些新的右翼抬頭，可能甚至跟以往跟經濟的那種右翼是不一樣的，現在有人稱為本土右翼或右翼民粹(有很多種不同的叫法)，但總體來說都是一種新的右翼思想，你如何看待這種新的現象？)

雖然是新，但我不意外。年青一輩是在六四事件、三聚氰氨的陰影下長大，又怎可能對中國有好感？我自己很多年都不想回內地旅遊，我想我有十幾年沒有回中國旅遊(不計工作)，我自己心理也是這樣，何況是年輕人？這是第一層。不認同中國人本身不一定是右翼，但是發展成為排斥中國人就開始是右翼，但這又有新與不新的一面。本土排外主義，思想來源就不新，都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國民黨，或是今天的共產黨，他們都是右翼民族主義，只不過他們的民族身份是中華民族，而本土右派則是香港民族論。

他們的思想淵源並不新，但是它對年輕人有吸引力，這就是新的。因為它和民族主義一樣，它製造了新的圖騰，而圖騰是有magical power（魔力），一拿圖騰出來你就要跪下。我想在老謀深算的人來說，他們只不過用這種東西為自己來充權，但另一方面給了假的權力感給年輕人，讓他們有一種優越感、權力感。讓他們擺脫無力感，所有法西斯主義都有這種特點，所以是很危險的。我們一定要正視它，我們一定要與他們競爭思想，否則年青人被吸引過去是很弊。不是我相信它可以發展成很強大的運動，而是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藉口，讓共產黨直接統治香港。以我對共產黨的認識，這些本土右翼裡有些人已經是他們的臥底，是絕對有可能，所以危險在這裡。這等於提供一個支點去讓共產黨去直接收回香港。我現在正在寫一篇文章，就是如果今天要跟共產黨鬥，我們就應該弱化民族或地域身份的論述，而強化民主論述，因為如果用民族身份去對抗，我們的下場會慘過西藏，但是今天的香港唯有佔據住民主的論述，即使暫時被壓制得很慘，但是會促進大陸民運的復興，從中共的後園反攻他們。

如果不裡通大陸人民，從根本上制約中共，港人是沒有辦法與中共鬥；短期、中期還可以鬥一鬥，但是拖延到二十年時間就死定。你到時仍然很年輕，你們始終要去面對。我已經老了，佔領我一定會去，但佔得多久呢？我做不到太多事情，要靠你們了。這是對香港的很大的考驗，如果我們不聰明地反抗，我們死定了。這跟左翼有何關係呢？何謂左翼和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不過就是最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已。所以左翼一定要全力投入爭取民主，哪怕是局部的民主，都比較專制好。

那些號稱左翼又根本否定爭取代議民主的人，客觀上都是中共的同路人。例如我看到一本號稱左翼的雜誌，有一期刊登的全都是假左翼之名，全盤否定代議民主的文章。其實這是「國家主義」、「國家萬歲」，很弊，但他們採用最革命的言詞。香港現在最弊的是甚麼呢？自稱民主派的，卻有太深的中產狹窄視野；自稱左翼的，或者是共產黨式的，或是沙龍式的。社會的改變、思想的改變是從實際鬥爭中，而不是講出來的。

(劉：過去有些社會派會認為托派是滲透、搶人的，金禧事件也出現這些講法，這些張力是怎樣的？)

當然有這些張力，但是這不過是正常的黨派自由競爭。而且，從實力對比來看，托派只是很小的組織。我想1978年青年托派統一後，我記得大概只有六、七十人而已，而且絕大部份不是大學生，大學生數量很少，所以在學院內基本上無法與國粹派爭奪，只能跟社會派結盟，例如吳仲賢會與曾澍基他們結盟，但是基本上托派經常都爭輸。你可以說由74年至78年，基本上大部份學生會與學生報都是在國粹派手中，印象中只有《學苑》，或中大學生報(視乎是哪一屆)是例外。

社會派本身都是被邊緣的，托派根本上在學院是不入流，雖然被攻擊得很厲害，寫大字報說托派是「反華反共反人民」，其實沒有太大影響力，有的主要都是通過社會派。當然我們有個別的大學生，不過不能公開身份，否則會很麻煩，而且人數也很少。所以張力主要來自國

粹派，他們排斥其他派，用盡一切官僚手段，那是一面倒的。當年我們在中大門口派傳單，都被國粹派驅趕，我記得當年是1976年宣傳天安門事件，他們說如果我們再派傳單就報警，所以我們是一面倒被國粹派排斥。連社會派，都根本沒有資格去排斥國粹派。現在我們很清楚，以前的新華社有一個教育工作組，就是專門做教育界和學生的統戰工作，也會找職業學生入大學，然後組成內圈、外圈，是相當有組織的。所以是中共國家機器在滲透學界。

(葉：從這個意義上去看，即使托派是很少的人，但反而我覺得思想上的影響反而是存在。我以自己的經驗為例，我以往讀書時我是參加國事學會，我作為新生想了解過去社會派、國粹派的人，他們到底講過些甚麼？要尋找這些資料是很困難的，你可能真的要找回當時的刊物，或是遇到以往的人，但倒過來國事學會的書架上肯定有幾本托派講馬克思主義的書，你們的《新苗》學生會是一定有的，很明顯你在70年代的時候可能在大專的影響力不是很大，但時間一拉長，而托派一直有做出版和思想探索的工作，所以慢慢形成思想層面中會有影響力。)

其實蘇聯都可以崩潰，何況是國粹派，去到77、78年，他們基本上是名譽掃地，我有親戚都是工聯會的，在四人幫倒台後，有很多定期到工聯會每週學習的忠心黨員，這時都罵那些領導：「林彪當權你就叫口號，什麼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倒台後又話他反革命，然後天安門事件又是反革命，後來卻話是革命行動，天下間豈有如此翻雲覆雨？」工聯會直到1967年，都有數以千計忠心的會員，他們真的反資反殖，但一場由北京操縱的暴動，卻把工人徹底出賣了。至於國粹派學生，最大的頭頭，後來都成為有錢有名的人，所以國粹派崩潰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被殖民如此長時間，香港政治上的能力是很不足的。我想，現在一些左翼青年，直接就幹起來，這是好的。不過，關於重大問題，例如香港的形勢、適合的戰略等等，估計錯誤的話，就會輸得很慘，這個也最好有個了解。

第一部份：解放馬克思主義者·四五行動·929事件（劉榮錦）

【標題為編輯所加】

受訪者：劉榮錦

訪問者：葉蔭聰、劉麗凝

訪問整理：劉麗凝

我常跟朋友說笑，我將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多年貢獻給了馬克思主義，由大學開始直到2001。我現在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會解釋為何後來我不敢再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段經歷裡，我明白到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學術觀點，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政治運動的理論，完全是兩回事，這兩個階段我都經歷過。以它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就需要講理論與實踐，當然，我還只是一個梳化椅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時，都經常講理論與實踐。但是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就不會知道在政治運動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實在是甚麼。但凡涉及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一定涉及政治鬥爭，所以我會講很多鬥爭的歷史，當然我會提到組織，會提到人物，但不會提名字（除已離開了的幾位前輩），我講事而不講人。

我2001年離開運動，離開時仍未放棄馬克思主義，個別前同志仍有保持聯絡，但基本上跟不熟的人我不再談政治（原因後面會講）。2001年至今，我只做過兩次訪問，今次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去年有一名來自內地的公共知識份子來港找了幾個人做訪問，其中一個是我。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離開運動已有一段長時間，為何會找我呢？但這位內地的朋友很想找我傾談，因為訪問安排得很趕，所以我完全沒有預備，後來這個訪問在外國一個電子媒體發表，不過他沒有把文章寄給我，我信賴他，但該次訪問不夠全面，因著上次訪問的經驗，訪談了大概三個小時，以及當時有些記憶都很模糊。所以今次訪問，我知道需要比較長的時間，讓我嘗試回憶及找回一些資料文件。

我1973年入香港大學，中學時沒有太多社會意識，只是喜歡踢足球。中學時社會出現了幾次運動，包括保釣、中文運動等，我都沒有參加。讀matriculation時，很喜歡經濟學，記得1973年入學第一年，我們需要修四科：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及統計學，本來我打算專攻經濟學，但是那一年我發覺經濟學太技術化，當時開始喜歡一些概念性的東西，所以第二、三年就主修社會學。我真正轉向馬克思主義是二年級時，其實第一年暑假已經開始接觸，當時開始閱讀一些哲學書籍和馬克思，第二年到第三年初，那個時期我主要閱讀馬克思早期到中期的書籍，最影響我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及《神聖家族》。當然還有其他早期作品，主要是唯物史觀，我當時是完全信服唯物史觀，所以就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在七十年代中期（歐美和香港）學院裡，馬克思主義者分為兩大派別：

第一派是人文馬克思主義（Humanist Marxist），例如有一位跟鄭經翰在電台講炒股票的人，他當時屬於人文馬克思主義；我入大學時曾澍基已經畢業了，他是讀哲學的，他當時已

經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我曾在一個研討會聽他講沙特，他仍是左翼，當時人文馬克思主義是最多人支持的。

另一派學院馬克思主義是結構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阿爾圖塞（Louis Althusser），我當時屬於阿爾圖塞派，極少數，香港大學可能只有我一個是阿爾圖塞派。我是結構馬克思主義，不過完全是學術，雖然在講座認識一些運動界人士，但自己則完全是學術上的嚮往。大學第三年後期及畢業後一段時間，個人思想很頹廢，所謂頹廢的意思是60、70年代歐美叫做Beatniks，就是「頹廢知識分子」的思想。除了馬克思主義，就是看文學小說，看藝術電影和聽前衛音樂。因此，雖然嚮往馬克思主義，在學生刊物寫的東西，很多都非常自我。有些文章我覺得寫得不錯，但是過於自我。

例如在《學苑》發表過一些英文詩，但我主要是搞社會學學會的刊物，做過一年總編輯及一年編委，因為只可以做一年總編輯，當時x x x就是《學苑》總編輯，跟x x x不算熟但都認識對方。無論如何，畢業後出來工作了數年，我工作的機構是公共機構，有很多英國人。親身感受到殖民主義，大學時已經有一點感受，但因為我跟大學講師關係較好，跟他們常有討論，所以沒有太感受到；但是工作期間親身感受到殖民主義的歧視、壓迫，是很厲害的，我跟英國人在機構內（特別是最後一年）是公開衝突，後來一名港大師妹告訴我，她加入這個機構時都聽到關於我的故事，就是我跟他們公開衝突，因此我不能再留在那個機構服務。離開機構後我在一間中學教書，然後跟一些以前相識的運動界人士有一些聯絡。當時70年代末運動界有三派，一個是「社會派」，社會派的基地是「一山書局」，在灣仔譚臣道，這班人學術性味道較重，他們當時自稱「新文化人」，刊物是《文化新潮》，他們目標是想在傳媒界「霸佔地盤」，想踢走胡菊人、李怡等人，並取代他們。本來，社會派學識水平最高，較適合我，但他們所走的是體制內路線，跟我傾向體制外路線不同。

第二派是托派，我作為一個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不是托派，但是後來跟托派有很多接觸。其中一個我不接受托派的原因是，他們說大陸是「變型工人國家」。

第三派是無政府主義者加解放共產主義者（libertarian communist），他們的基地在灣仔的「1984書屋」，我跟他們最熟，以前讀大學時候認識他們，所以我到他們書局去聊天，他們當時有一位由保釣開始，不過現在較少搞運動的朋友，是香港無政府主義的大旗手，我跟他很熟絡，亦跟其他1984書屋的人進行討論，當時書局有一班之前從大陸潛逃來港的前紅衛兵，個別還有上來書局，如果用今天俗語來說就是「吹水」。

(葉：為甚麼前紅衛兵會走去1984書屋，而不是去接觸托派？)

他們都是認識的，因為1984比較開放，托派組織很嚴密，還有1984書屋有幫他們出書，其中有一本書很出名，名為《理性的黃昏》，這本書可說是一份歷史文獻，是一名叫虞雪的前紅衛兵領袖寫的，她從內地逃來香港。我比較集中書局方面，因為1984書局的人及托派當

時的領導人，他們之前都到過歐洲，而且認識很多左翼組織，這些左翼組織寄來的刊物實在太多，我就幫忙整理一下。另外，我又開始負責跟海外組織進行有系統的交流討論，當時外國有幾個較為重要的組織。

當時外國的左翼組織包括：第一個是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社會主義工人黨今天仍然存在，應該是全球最大的左翼組織，他們出版週報、月刊及季刊（季刊較理論性），直到現在他們仍寄刊物給我，我跟他們個別領導人作過交流，其中一位現時是倫敦大學King's College的教授。這是托派第四國際所分裂出來的一個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亦被稱為布哈林派。

第二個比較大的組織，稱為「盧森堡派」。盧森堡派是羅莎盧森堡的意思，盧森堡派是30年代法國共產黨（第三國際）左翼分裂出來的。

另一派由30年代意大利共產黨第三國際分裂出來，這派別的名稱我現在有點模糊。到底盧森堡派與這一派是否仍然存在呢？我目前也不太肯定，但是這三派有一個共通點，或者與托派的分別在於：托派認為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其他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稱為「變種工人國家」或「變型工人國家」。何謂墮落？何謂變種？墮落的意思就是1917年十月革命，他們承認這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墮落了變成一個「墮落工人國家」。其他稱為「變種（deformed）」，因為這些國家都不是由工人起義所建立，是蘇聯紅軍所建立，中國就是農民軍隊所建立，但是他們的社會、經濟性質跟蘇聯都屬同一個型，所以認為他們都是工人國家，不過被稱為變種，因為他們的建立起源並不是工人革命。

這三派則不認為蘇聯、中國是社會主義，布哈林派認為是資本主義，他們的分析我以前就不認同，今天看來更覺得太簡單化，盧森堡派都認為他們是資本主義，另外意共出來的那一派也一樣。此外還有很多組織跟我都有聯絡，但這三派在歐洲（除了第四國際外）規模較大，以及思想性較強，還有很多無政府主義者，一些創世主義者（68年在法國的運動中稱作Situationist），我也有跟他們聯絡，但是我主要的討論都是集中在那幾大派別。

不同的派別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以前我是學術馬克思主義，但在1984書局的那段時間我就開始要考慮實際的政治。例如蘇聯是否墮落工人國家這問題，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如果美國與蘇聯要開戰的話，你站在哪一邊？第四國際是站在蘇聯那邊的，因為它的性質是墮落工人國家，是很實際的問題。又例如第四國際在英國的支部Militant討論應不應該進入工黨。因為70年代的工黨是非常左的，到底應不應該參加呢？參加會否被同化？參加的理由是希望透過工黨影響工人階級，因為工黨的工會基礎很強，所以參不參加是一個實際的實踐問題，但是你又要有理論根據以支持這個決定，所以那段時間跟外國組織討論，他們所接觸到的實際問題，都是我所須要思考的，雖然當時香港沒有太多運動，例如78、79年有「北京之春」，80年跟大陸的異見人士聯絡，那段時間我都有參與，但不是太投入，那段時間就是劉山青被捕，托派領導人吳仲賢亦都被捕，不過後來回到香港，我後來跟吳仲賢很熟絡。

無論如何，我都有參加這些運動，但始終投入不是太強。從我作為學術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我首要的關注都是理論，所以即使作為政治運動上的馬克思主義者，理論上的問題未搞清楚之前，我對於實踐是否符合理論，有一定的顧慮。這跟多數參加運動的人不同，他們一般都是感性先行。這點我後面會再談到。

(葉：你不是革馬盟的成員？)

我不是革馬盟的成員，我當時跟他們有聯絡，我當時界定自己為「解放共產主義者」，就是近似社會主義工人黨、盧森堡派，還有一個在英國稱為「共產主義工人」的組織。我前往意大利米蘭探訪過上述從意共分裂出來的左翼，跟他們討論，他們有工會基礎，其實第三國際意共左翼脫離出來的左翼組織，從三十年代開始一直有很強的傳統，盧森堡派都是始於三十年代傳統的。我當時比較傾向盧森堡派，後來就傾向於意共分裂出來的這一班，我在討論期間發現有兩個理論問題要解決，就是蘇聯、中國這些國家是甚麼性質？這是一個理論指導實踐的問題，如果我認同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卻不認同現在蘇聯屬於社會主義國家，這轉變自必涉及一個墮落過程，而墮落一定有一個質變的終點。這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問題，必須解決。

第二，當我讀馬克思晚期的作品，在大學時期我開始讀《資本論》，但不明白，於是後來用了很多時間和心機讀他晚期作品，我想目前香港裡還保留了列寧全集的人應該所餘無幾，甚至可能只有我一個。例如《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我這些年來前後看了不下一百次，就是「方法論」那一章，每一次看都有新體會，那段時間因為要解決這些理論問題，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去閱讀馬克思晚期作品。第二個問題就是讀完這些作品的結論是：社會主義必定是計劃經濟，而蘇聯、中國這些國家是計劃經濟，為甚麼認為他們不是社會主義呢？

當時這兩個最大的理論問題，我花了大概兩、三年時間研究和跟人討論，後來我寫了一本書，就是關於這兩個問題：1) 十月革命如何墮落？去到一個終結時為何會變成一個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2) 從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為何計劃經濟本身不足以構成社會主義，如果我當時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為何計劃經濟可以跟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的基礎）並行不悖？

如果現在我再思考這些問題，跟過去我所思考的會有一點差別。經過幾年研究，當時認為已取得一個基本的解決，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後就開始讀托洛茨基，雖然我從來不是托派，但托洛茨基的作品對我影響很大，我花了一年多時間研究他，越讀就越信服他，雖然我並不同意他某些關鍵的結論，這關乎到托派理論的問題。托洛茨基最為有名的是「不斷革命論」，當時俄羅斯馬克思主義運動有三派，一派叫「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所有行動都必須合法，現在是資產階級革命，即俄羅斯下一步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現在還未到工人階級的革命，所以做甚麼都一定要合法。第二個派別叫做「孟雪維克（Menshevik）」，認為可以進行不合法鬥爭，但提出「革命階段論」，俄羅斯下一步是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之後、資本主義成熟後才到工人革命，所以現階段工人黨在俄羅斯的角色是支持資產階級的政黨，這就

是「革命階段論」，一個階段跟著另一個階段，不可逾越。第三派是布爾雪維克（Bolshevik），我對列寧的作品差不多滾瓜爛熟了，直到1917年，列寧都是革命階段論。

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斷革命論」委實出色。他說，俄羅斯的確是一個半封建社會，資產階級革命未發生，但是不能將俄羅斯抽離自全球資本主義的脈絡，雖然俄羅斯未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他的工業已經非常發達，當時全球最大的工廠就在聖彼德堡，四萬工人。雖然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發展很不平衡，非常集中在某幾個地方，但因為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工業已經存在，所以工人階級已經發展至一個很成熟的階段，故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害怕工人階級，所以他們不會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只會跟沙皇政權合作來對付工人階級，所以當反對沙皇的革命開始，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應贊助資產階級，而應直接把社會主義革命提上日程，這是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去講俄羅斯革命下一步應該如何走，這和革命階段論完全不同。

當我讀「不斷革命論」時真的不禁嘆服，真的很厲害。1917年革命由4月開始，托洛茨基於1905年第一次工人起義之後寫「不斷革命論」，1917年的革命過程印證了他的分析之正確性，而列寧在1917年4月開始就放棄革命階段論（但沒有公開講），實際上改為支持「不斷革命論」，所以才會提出應該由工人階級進行革命。

然後看托洛茨基對俄國革命墮落的分析，他認為政治上是墮落了，這個官僚集團篡奪了工人國家的權力，但是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會、經濟制度，主要就是走財產國家化，這個社會經濟制度沒有改變過，所以他稱這是「墮落工人國家」，故此，對這個墮落工人國家，目標限於進行一場政治革命即推翻官僚層，不需要推翻社會經濟制度。我當時不同意這個觀點，但他的觀點之另一方面跟我的立場則殊途而同歸。按他說，如果這是一個墮落工人國家，當帝國主義跟蘇聯發生糾紛，你會站在哪一邊？他認為工人政黨應該站在蘇聯那一邊，應該是政治上批判官僚集團，軍事上要支持蘇聯。雖然我不認為它是墮落工人國家，但是他將國際糾紛置於帝國主義的體系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則完全同意。但二次大戰後蘇聯紅軍在東歐建立附庸國，從而變成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托派於中蘇糾紛按墮落工人國家論而站在蘇聯那一邊，我便不能同意了。

為甚麼我要解釋孟雪維克、布爾雪維克及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原因很簡單，因為以我的觀察，香港托派也包含了這三派（就布爾雪維克而言，是一個缺乏列寧的布爾雪維克，即僅屬行動型），我與他們共同參與運動有一段長時間，自己親身體驗到，這點下面會詳細講。

另一個理論問題關於中國，我讀完托洛茨基後便看毛澤東。未讀毛澤東之前，關於1920年代，我先講一講中國托派的起源。1927年國民黨清黨，將共產黨屠殺，共產黨1921年建黨，當時第三國際直接指揮當時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陳獨秀聽從第三國際指揮，第三國際的指揮是，當時是史太林控制政權，史太林就是用革命階段論，他說中國革命下一階段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共產黨人應該要支持資產階級革命，故共產黨人應該要加入國民黨。國民黨亦接受，因為蘇聯經濟支援給國民黨，所以共產黨人入了國民黨，然後蔣介石北伐攻打軍閥，共產黨一齊上去，直到1927年4月在上海國民黨進行清黨，屠殺共產黨人。能逃亡的都

逃亡，這次對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後來托洛茨基分析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他就是用「不斷革命論」，其實未清黨之前，托洛茨基已經在蘇聯提出，跟十月革命前俄羅斯的情況一樣，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加入國民黨，應該按「不斷革命論」直接提升至社會主義革命，托洛茨基分析得相當準確。清黨後有一些中共領導人，包括彭述之，他是共產黨第一屆宣傳部長，輩份比毛澤東還要高，彭述之有份前往蘇聯，接觸到托洛斯基講中國革命的說法，發覺托洛斯基的說法是對的，所以整班人變成了托派。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分析，他的分析在二十年代的清黨一一應驗，所以彭述之等人前往蘇聯後全部變成托派，托派思想其實就在那個時候開始。

毛澤東很厲害，他分析中國革命.....托洛茨基分析二十年代的情況，毛澤東分析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國革命階級力量對比，他對中國革命的分析幾乎可以媲美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水平非常高，毛澤東講中國不同階級的利益和力量對比相當準確，所以我對毛澤東是有些敬佩的，理論上原來是如此出色。無論如何，當時自己的思想從盧森堡派等全盤否定中國，叫它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有些轉變，即是不全盤否定共產黨，因為如果從國際帝國主義的高度來看，共產黨的確是有功績的。功績就是打敗帝國主義，共產黨打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如果問到我，我會坦白地說我不全盤否定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反帝的核心思想，自二十、三十年代以來貫穿他們整個精神和意識，直到今天他們仍然有這個精神和意識。所以現在於國際政治舞台上，當然中國政府有自己的利益考慮，但是在一些關鍵問題，能夠站在反帝立場，站得比較貫徹的還是中共。就算你否定中共百份之九十九，但這百份之一我是不會否定的。直到今天，作為左翼，看待中共的態度應以這個理論的角度為立足點，不應感性先行，這點極為重要。

雖然八十年代初中葉香港沒有甚麼運動，但為了解決自己思想而接觸到的問題，都是一些實質的問題，而且引申到理論問題，例如到底加不加入工會？如果蘇聯與美國發生衝突到底要站在哪一邊？所以思想與之前在學院坐在梳化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時代是完全兩回事。因為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比較熟悉，尤其是資本論，香港熟讀資本論的人餘下沒有多少個，我不知托派的前輩是怎樣。我曾經開過《資本論》學習班。

(葉：是在1984書局開學習班嗎？)

不是，1984書局後來沒錢交租所以結束了，我是在一個托派組織「十月評論」其中一個地方開學習班，參加者是托派及托派外圍的人，這個學習班不是開了很長時間（不足半年），因為搞運動而停止了。說到自己搞運動的經歷就一定涉及托派，我剛才簡單提及過二十年代托派的起源，後來陳獨秀都是托派，但不肯定他最後有沒有離開托派。總之托派一直是中共的反對派，到中共1949年奪權後托派仍然在大陸活動，但1952年就突然一夜間全部都被抓走了。Gregor Benton有一本書“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講解中國托派歷史，我曾經接觸過他但不是太熟。1952年中共突然拘捕托派人士，但有些人逃走到香港，有部份人留在香港，也有人走到巴黎，當時托派已成立了第四國際，總部在巴黎。中國托派自此在香港存在，雖然它存在，但性質完

全是地下組織，所以沒有人認識，又沒有活動。直到何時才浮面呢？就是保釣運動那段時間，吳仲賢和「白頭佬」（我姑且稱這位前輩做「白頭佬」）都有份參與，托派就開始接觸他們，後來一班人（包括吳仲賢）前往歐洲與中國托派討論，被說服後就回到香港正式成立托派，反而老一輩的托派人士還是很沉寂。之後托派有三個組織，第一個是「革馬盟」，革馬盟目前應該不再存在了，第二個是「十月評論」，第三個最初稱為「新苗」，後來稱為「先驅」，到底新苗／先驅作為一個組織是否仍然存在？可能仍然存在，我現在認識「左翼廿一」的人都是新苗的人；我已經很疏離的了，如果出錯也不出奇。總之馬克思團體，包括托派組織，有時區分黨和front organization，黨在後面，但會組織一個群眾或半群眾組織，今天的「左翼廿一」到底是黨還是半群眾組織，我不敢說，說不定是半群眾組織。

這三派有甚麼分別呢？因為我不是托派成員，但跟他們一起搞運動、合作的時候，他們在閒談間告訴我的，可能資料上不是完全準確，但據我所知「十月評論」與「革馬盟」的分別是「多數派」與「少數派」，無論如何，十月的領導是彭述之，革馬盟的領袖是王凡西，王凡西去了英國，他的筆名是「雙山」，是革馬盟的精神領袖。因為Gregor Benton在英國跟王凡西很熟絡，所以Gregor Benton才能夠寫出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 這本書，是王凡西提供的資料。

革馬盟成立的時候，王凡西已經去了英國。後來有些書記錄了內部糾紛，我也保留了一些，其實就是雙山與彭述之派別的恩怨，我當時也會讀一點。革馬盟是行動派，吳仲賢是革馬盟的領袖，他文筆非常了得，政治觸覺很靈敏，寫文速度很快。「十月評論」則喜歡出版，若要寫香港托派歷史，必須找「十月評論」，即使我與托派合作了一段時間，但我只認識少數「十月評論」的人。

托派「老鬼」我也只遇過一兩個，其實十月評論有一些中年一代，跟我年紀差不多，他們加入是因為他們爸爸都是十月評論的成員；另一派就是新苗，我不太清楚為甚麼他們會離開革馬盟。我是從鬥爭中對這三派的認識比較深，之前的認識是很片面的，我會形容「新苗／先驅」等於十月革命前俄羅斯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先驅／新苗的精神領袖是一名「老鬼」，長期住在澳門，我離開運動前曾與他在研討會上見過面，年紀已經很大，很瘦，筆名是「向X」，這是他們的精神領袖。新苗的領導人（筆名劉XX）是這個精神領袖的大弟子。為何我形容他們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呢？1988年大陸民運開始興起，當時有一班人走在一起，就是後來的四五行動，這班人當中在政治思想上最具思想性的，其實就是三派托派及我，我是獨行俠，跟十月及革馬較熟，經常跟他們（特別是革馬）在街上派傳單、飲茶、聊天，我又信服托洛茨基很多東西，但就是因為我不認同托派就大陸是變型工人國家的觀點，就成為我和托派的最大分別，其他如「不斷革命論」等我和托派都非常接近。1988年除了舉辦資本論學習班外，還有參加一些講座，少許諷刺的是，一個非托派的人運用「不斷革命論」分析香港的階級情況，及香港和內地的鬥爭的可能性，我想我是第一人。在研討會上，我是用「不斷革命論」來推論的，托派的人是同意我的。

我等一會給你一份四五行動之後出版的對於八九民運的分析，之前的都是透過研討會分享的。當時香港運動的氣候開始變得活躍，四五行動除了三派托派、我這個獨行俠，其他的都是一些托派的外圍人士，即是跟托派很熟但又不是正式加入，有些我不清楚到底屬於外圍還是成員，因為我不是托派的人，我知道他們經常走在一起，但不肯定是不是成員；另外還有一些記者、文化界人士，每次四五行動開會都會有數十人。四五行動不太組織化，後來不記得誰提議「四五行動」這名稱。

(葉：我們有位同事劉健芝，也曾是成員。)

對，她當初是四五行動的成員之一。1989年4月5日四五行動紀念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紀念日），決定前往新華社，當時有一位區議員是四五行動的發言人，可見四五行動的組織是很鬆散的。當時我們在一個地方開會討論應否申請牌照，今天一代的香港人可能不知道過去的公安法是如此嚴厲，不能用大聲公、集會人數超過特定數目就要分開每二十人一隊，當年「民促會」前往新華社去抗議都要逐二十人行過去，而且事先要取得許可證。當時我們討論應否申請許可證，所有人都說不申請，所以我們沒有申請，然後警方透過某些渠道表達訊息給我們，就是警方會提供遊行許可證給我們，於是我們討論接不接受遊行許可證。當時我認為不接受，但「先驅／新苗」的領導人極力主張我們一定要接受，我到現在仍記憶猶新，他說：「如果你們不接受的話，你們所有人都會被拘捕。」他是少數意見所以被否決。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先驅／新苗」好比俄羅斯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而我這個判斷在後來多次鬥爭經驗中得到了印證。1989年4月5日去遊行，在天星碼頭有一位洋警司找那位區議員（因為他是發言人），說：「現在我們給你許可證。」因為我們事先討論過不要許可證，然後我們由中環一直行到新華社，沿途與警方有輕微的衝突（都算不上衝突，主要是爭論），我們不讓步但警察都讓步，後來我們所有人走過去新華社了，所以那次我們叫做「勝利」，遊行後我們開檢討會，新苗的領導人也有參與，我也有猛烈地批評他，新苗就自此退出四五行動。

(葉：所以這件事件前新苗都是四五行動的成員之一？)

當時已經叫四五行動，是一個很鬆散的集結，人數幾十人，算不上成員不成員，思想性較強的人是三派托派及我。因為那次事件，新苗的立場就被證明是錯誤的，所以自從那一次事件後不再在四五行動看見任何新苗的人。這份文件（題目：告別衝擊文化）是劉XX九七年回歸前發放的一份文件，最低限度由我認識他，由搞運動到當日，他的立場是很一貫的，所以我稱這一派托派為「合法馬克思主義者」。

我形容「十月評論」為孟雪維克，他們是「革命階段論」。這是我從行動、鬥爭的過程中體會到的，後面會詳細講。我不會形容革馬盟為布爾雪維克，吳仲賢是革馬盟中思想性較強的人，他在革馬盟可否比作布爾雪維克中的列寧，我留待他人評價，但自他離開革馬盟後，基本上沒有人「寫得」，他們主要是行動派，1988、1989年他們就迎合了形勢，因為當時社會運動向上，所以行動派就切合到形勢。

四五行動在4月5日的示威後，我本人原來是比較低調和傾向思想性，即使參與鬥爭時我也不高調，不過那一次遊行期間我都曾拿過咪高峰發言，好像在街上都「打得吓」，所以在四五行動開始變得較為高調。

說到這裡我要講一講左翼與主流民主派最主要的分別在於甚麼。主流民主派是「香港本位主義」；托派認為大陸是一個變型工人國家，所以當然支持回歸，而香港勞動階級與國內勞動階級聯合亦作為一個目標。我不是托派，但與托派就這兩個觀點是一樣的。所以，可以見到的是由70年代末開始，當北京之春運動開始，直到89年北京學運初期，香港只有左翼的人強調跟國內聯合，所以在北京之春後期跟王希哲、傅新奇等聯絡的都是香港的左翼。所以山青及吳仲賢是在這個情況下被拘捕，當時不止托派，例如作為解放共產主義者的我，另外一些都不算是甚麼派別的，只是左翼的知識份子，他們都一齊參與一個很鬆散聚合，都是支援國內的民主運動，直到山青被捕後就營救劉山青，在支持國內民運裡，香港的主流民主派完全不參與，山青被捕後嘗試找主流民主派領導人，要求他們支持但被拒絕。因為他們的著眼點是香港本位利益，而不是視香港人民（人民這個詞不準確，應該說是香港的勞動階級）及中國勞動階級聯合起來，不是從這個角度去看的。為甚麼要聯合起來呢？香港問題到今時今日，雖然再沒有人提，香港問題是一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問題，我們必須從這個高度去看，香港的出路是香港勞動人民與中國勞動人民聯合起來。

1988年我在一些研討會提出用不斷革命論去分析香港和大陸，首先講香港，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中產階級運動（近七、八年來的情況起了變化，下面會略說一下），香港中產階級既得利益很豐厚，所以很多中產階級害怕回歸而移民外國，當取得綠咭後就立即回港，因為他們在全球其他地方所能取得的利益，比不上在香港，所以我當時的分析是香港中產階級不會跟殖民地政府及大財團有很深的矛盾。如果香港勞動人民動員起來，香港中產階級會站在殖民地集團那一邊，正如托洛茨基分析俄羅斯的情況，香港中產階級民主運動是沒有出路的，因為沒有實力，而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中產階級亦都會跟殖民地政府．．．．．我們當年會用多一點政治性的用語如「分贓妥協」，這是列寧的用語。

故當時香港不能以革命階段論來看，不可以說香港下一個階段是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至於中國，新生階級是民營資產階級，最出名是萬潤南，萬潤南就是四通電腦公司，為甚麼四通會發達呢？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做了倉頡輸入法，這個階級會不會跟中共政權決一死戰？我認為不會，所以同一道理，中國下一個革命不是以民營資產階級做主導，所以如果我們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講推動革命時，不要再想革命階段論，應該要想不斷革命論作為指導綱領。從帝國主義的高度來看香港問題，香港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問題，所以左翼必須站在反帝反殖的立場。從這個階級實力、階級利益分配分析和對比，香港的工人階級的革命組織的策略、戰略不能是革命階段論，而是跟國內勞動人民聯合起來，香港的勞動階級沒有實力可以推翻殖民地政權，唯一可以解決中港問題就是必須要聯合內地的勞動階級，否則你解決不了。這是我當時的看法。

雖然這個具體分析是1988年在某些研討會中首次提出來，關於香港中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分析，香港中產階級民主運動的背景、實力及取向的分析，這些都是當年才提出來，雖然如此，之前我們左翼的人原則上已同意了香港問題不能獨立於中國，但是當時主流民主派不是這樣，他們是本位利益主義，所以從來不會涉獵內地的問題，例如要求他們支持營救劉山青被拒絕。這個情況直到1989年北京學運越來越澎湃，我記得好像在五月四日，我們四五行動就開始第一次大集會就是支持學生運動，接著我們舉行了一連串集會遊行示威，很多人參加，從未試過可以動員這麼多的人，主流民主派亦貫徹他們過往的立場，就是維持不出聲。直到五月中旬主流民主派的一個核心成員，因為他本身是區議員，跟我們某些朋友很熟，他就打電話給我們其中一位成員，其中問了一條問題：「你們是否打算1991年參選立法局（當時是局）？」原來他們最關心的是我們會否參加立法局選舉。你可以猜想到他們有一個擔心，他們當然知道四五行動是左翼，而這班人開始能夠動員到群眾，他們擔心到底1991年立法局選舉會否殺出一路奇兵影響到他們的選情。所以你可以想到他們的關注點是甚麼。

我記得好像是五月十五、十六日（可翻查報紙），我們當時號召了一個遊行集會前往新華社，當時主流民主派第一次號召遊行，兩路兵馬走不同的路線，還有二百多米就到達新華社，在馬會對開就狹路相逢，大家剛好同一時間到達那個位置，很尷尬。我們其實是先行他們一步，可能是領先他們二、三十公尺，於是我們邀請他們也加入，他們所有領袖就站著不動，說：「如果你們要行就行先。」我們覺得很好笑，所以最後是兩批人各自先後行，而不是一起前往。這是他們第一次參與集會遊行，而那個區議員的電話給了我一些啟示，他們的焦點仍是擔心四五行動會在1991年的立法局第一次選舉殺出一路奇兵，而這路奇兵是可以動員得到群眾的。後來北京學生絕食，於是發動支聯會；發動支聯會的建議不是來自主流民主派，是吳仲賢找主流民主派其中一位領導人（當時兩個主要領導人的其中一位）邀請他發動，這是吳仲賢親口跟我說的，他提出一個要求，就是支聯會不能排除四五行動，當時那位主流民主派的領袖同意了，所以後來成立支聯會後四五行動也可以加入。

支聯會成立後有報章替他們宣傳動員，我們沒有，除了個別人士（包括我讀大學時的那位學苑總編輯）有時會在電台某些清談節目幫我們宣傳一下，我們就主要透過派傳單。所以當年香港主流民主派會支持內地運動的背景就是這樣出來的。其實他們是被迫出來的，你都知道主流民主派的兩位主要領導人亦是基本法草委會的委員，所以主流民主派是在九七後政治可以分一杯羹，但是因為擔心四五行動成為參選本港政治的一路奇兵而被迫走出來，所以我們當時跟支聯會一直都有鬥爭。

說回運用不斷革命論，馬克思主義運動有一個原則，而我們參加支聯會某程度上已經背離了這個原則。馬克思主義運動區分兩種陣線，一種叫聯合陣線（United Front），就是工人階級的不同組織，例如香港的工聯會和職工盟，就某一個議題聯合鬥爭的話，這是聯合陣線，因為大家都是工人階級。但如果跨階級的合作就叫做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立場是會組織聯合陣線，但是不會參加人民陣線，所以當我們參加支聯會就已經背棄了這個原則。當時自己也有責任，但我們堅持一件事，就是當你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角度來說，你不會在這個陣線裡放棄自己的政治聲音，意思即是在這個陣線內活動也會繼續公開提

出自己的綱領，對這個陣線的領導提出批判，所以我們跟支聯會存在很大的糾紛。總結一句，參加支聯會形式上是一種背叛，但由於我們在支聯會內按左翼立場公開跟支聯會領導進行鬥爭，故實質上這個背叛亦非嚴重。

如何體現與支聯會的鬥爭？我剛才提及過，站在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這場鬥爭，戰略一定是跟國內勞動人民聯合。我們需要提高香港人對民族的認同感，所以我們在遊行舉國旗和教遊行人士唱國歌；有人曾經問我：「你舉五星旗是否代表你認同共產黨？」早期四五行動的一位托派外圍人士，是位文化人，他也問：「舉五星紅旗是否認同共產黨？知不知五粒星的意義是甚麼？」我回答：「舉五星紅旗不等如認同共產黨，而是強調這個運動是聯合國內的群眾，而不是香港本位的運動。」支聯會雖然有「愛國」這個字，但從來淡化這點。記得有一次五月二十三日還是二十八日的維園集會，我們四五行動有去，亦有舉起五星旗，一位支聯會的領導人，他是教協的領導人，他用擴音器叫我們放低國旗。我們拒絕放下國旗，你看到這雖然看似一件小事，但你可以見到路線的分別。

剛才我提過托派也分成三派，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那一派已經在四月五日的行動後就退出了，剩下十月評論及革馬盟，十月評論是革命階段論的擁護者，是俄羅斯革命的孟雪維克，我為何會作出這判斷呢？因為在支聯會成立後，我們會在很多傳單（可惜我們沒有保留下來）提出我們的政治路線和批評支聯會領導的路線，但十月評論的人不同意傳單的內容；當時四五行動的組織不嚴格，我們一邊開會同時又立即草擬傳單，草擬後就馬上拿出來討論，因為我們比十評的人有效率和較努力草擬傳單，如果辯論勝出就會在傳單上刊登你所寫的內容，我們很多張傳單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而獲得通過，傳單的立場是偏向我和革馬盟的立場，就是我們認為如果支聯會的領導是錯誤的話，我們會提出批評。十月評論的人對此不太滿意，他們認為既然支聯會已經成立，我們就應該以支持支聯會為主要任務，這是十月評論在會議期間的立場，我當時就體會到他們就是孟雪維克（革命階段論），認為香港下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所以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應該要支持他們。當時學生運動高漲，而我們的立場比較切合當時的形勢，於是獲得較多人支持，後來十評淡出四五行動。這點下面還會再談。

我們跟支聯會路線上最大的分歧發生於六四之後，發生六四事件後行政局內有一些人（包括當時浸會大學校長謝志偉）提出居英權，支聯會就立即提出「港人救港」運動（即要求居英權），其實支聯會是後知後覺（跟隨行政局）。當支聯會提出「港人救港」運動後，四五行動就要提出自己的立場。就是理論、綱領與實踐的問題，學術馬克思主義不進行實際鬥爭，故不需要考慮這些問題，但你在一個鬥爭就需要去考慮採取甚麼立場，以及立場背後有甚麼理論支持。我們的理論指導原則是，香港的解放是跟大陸勞動人民聯合，所以我們的回應是否定「港人救港」運動，當時我們出了一張傳單（對我來說，這是四五行動在整個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張傳單，可惜沒有保留下來），那張傳單的口號不是我提出的，是當時革馬的第一把手所提出的，就是「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意思是若果好像支聯會立場從本位利益出發去爭取居英權的話，首先違反了左翼的綱領性原則，第二是支援運動將會瓦解，所以我們的傳單分析了這個問題。如果從一個帝國主義的高度就是「中港本是一家」這一句，「救國才能救港」是對中港鬥爭展望的分析；不知道十月評論會不會保留了這張傳單，總之當時跟支聯會是決裂，我記得六四之後數天我們出了這張傳單。支聯會號召一個集會遊行至

港督府要求居英權，我們在同一晚號召遊行至新華社，我記得那一晚都有三、四千人參加我們的遊行，到達新華社我們有演講，我手持咪高峰時就特別強調「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這點，並公開批評支聯會的「港人救港」。當時的反應相當好，有人傳字條上來表示完全贊同，這是我們跟支聯會最嚴重的決裂。

事後，十月評論不再出席四五行動的會議及我們在天星碼頭長期駐紮的大本營，所以我親身體會後我才認為十月評論是孟雪維克。香港沒有布爾雪維克，革馬盟做不到布爾雪維克，沒有列寧；布爾雪維克思想上其實就是一個列寧，你可能問如果吳仲賢在革馬盟的話或者可能做得到，當時吳仲賢經常走來．．．．．（雖然他已退出運動）。

(葉：當時吳仲賢還不算是四五行動的人？)

他不是，他只不過經常走過來天星碼頭，他因為大陸「那件事」而被逐出革馬盟，直到他過身前他跟我說，他仍支持社會主義，但正如我之前所說，跟學術馬克思主義一樣，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傾向與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運動的理論是兩回事，我覺得當時吳仲賢距離真正馬克思主義實踐是太遠了（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後來我們從天星碼頭撤退。我講一講929事件及四五行動正式成立。四五行動是在運動退潮後才正式成立，當時我們在花墟道租了一個舊樓二樓的單位。

(葉：我去過那個單位，就是929事件之後有一次長毛約了學生上去開會，當時我是代表中大上去開會，當時你可能仍在醫院。)

我們在那個會址成立大會，我記得正式成立時大約有八十人左右，正式填妥入會表格及交會費，成立大會開會時要選組織的領導，當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出現，但十評卻出現了。我們建議在成立大會的會議裡選出一個七人常委會；十評認為常委會太集中化，他們建議選幾個小組來分別負責為會員提供不同的活動，他們的用意很簡單，如果是成立不同的小組的話，他們有機會可以領導部份小組，但如果選常委會的話，他們一定入不了領導層，事實上他們之前已失蹤了一段時間。

我不久之後就後悔自己當日的決定，始終我的政治鬥爭經驗尚淺，我和革馬盟的成員認同要建立常委會而反對十評的建議，當時絕大部份開會的成員都不認識十評的人，因為他們有一段長時間沒有出現，而只認識我們，所以大會最終否決了他們的建議，自此之後十評就再沒有在四五行動出現過了。為何我不久後就後悔呢？當時運動是退潮而不是向上，如果形勢向上，革馬盟就切合形勢，但形勢向下的話，第一革馬盟欠缺寫文的人，第二不適合做一些比較需要耐性的工作。在退潮之後，四五行動進行內部討論的時候，例如我提出應該組織一些為評論版寫文的班子，被其中一個（不是革馬盟的，而是一個新力軍）年輕人大罵，說我要搞論政而不搞鬥爭。我就是因為他這句話就覺悟到我當初做錯了決定，我不應該反對十評，雖然他們的理論水平不高，但是他們是會做比較平實的文字工作，如果需要人寫文章的話，他們會做得比革馬盟好。當運動形勢較低的時候，你就需要這些人。

回到929事件，那是一次很例行的行動，就是國慶酒會，我們就在崇光集合，當時我是發言人，我就跟警司商量路線，警司跟我說只可以行到某一個地點，大家都同意的。以前我很多時不會接受警方的建議，前提是運動的形勢是上漲，如果運動已退潮就不可以這樣，其實警方最初同意我們前往會場外的一個示威區（接近世貿中心正門側邊），容許我們在那裡示威，我覺得那個位置算是不錯的地方。但我們還未步出百德新街街口就被警方截停了，一個名為貝利的洋警司不讓我們前進，於是就發生了衝突；我們互相僵持了一段時間，最後一次衝突中我們事實上有推鐵欄，情況都有點混亂，接著那位洋警司突然從後一推，把我推向六、七名軍裝警察，然後在馬路中心「警棍齊飛」，當晚警方拘捕了四個人，包括我、一位四五行動的成員、一個外籍人士，這個外籍人士很有趣，是我大學講師的兒子，他是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成員，剛剛來到香港參加我們的行動，便被警方拘捕；我們被拉入某幢大廈的樓梯，這位外籍人士就哭了起來，我記得我叫他收聲不要再哭了。

當時香港只有兩家電視新聞台，如果你說警察失控他們真的是失控了，在馬路中心六、七警察真的是亂棍齊飛，怎會看不到呢？後來吳仲賢告訴我，其中一間電視台拍到警察打人的片，但沒有「出街」，所以你說，香港的報紙、傳媒，九七前後有多大分別？總之就是不播出來，當時應該有不少記者目睹，但沒有人出聲。有一個獨立紀錄片制片人拍到一個片段，後來我被送到瑪麗醫院羈留病床，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拘留了四十八小時；然後就送往法院提堂，當時有一個代表律師，他是常委會其中一個委員的朋友，代表律師要求保釋外出，當時洋警官反對我們保釋，那個法官就批准我們保釋，但告了我四項罪名，應該是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厲的控罪，包括：使用暴力、煽動他人使用暴力、襲警及非法集會。

其他人全部被控非法集會，當晚拉了我們四個人，反而那個英國人好像被釋放，終於最後是告我們七個人，當時四五行動常委會有七個人，警察告我們當中六個。我被扣留四十八小時出來後，我們常委會內其中一人（革馬盟的第一把手）當晚沒有被捕，因為他當時不在場，另外一個革馬盟的外圍人士，他不是常委會，當日亦沒有被捕，之後我們知道警方想拘捕所有常委會成員，我當時住在土瓜灣，事實上是廿四小時都有便衣警察監視和跟踪，目的是想拘捕其餘兩名常委會成員。常委會是需要開會的，如果我們要開會就要想辦法擺脫他們，否則其餘兩名委員就會被捕，最初曾試過在青年旅社開會，後來發覺那兩個成員都不能回家，變得很不方便，所以最後決定引導跟踪我們的警察來拘捕他們，最終就拉了七個人。

我跟律師討論時，我透露有一條紀錄片拍攝到我們被警察打的經過，希望可以提上法庭；這位大狀說要紀錄片的拍攝者願意上庭作證才可以將錄影帶變成為呈堂證物，所以我邀請這位導演與大狀一同商議，這位紀錄片的擁有人容許我們將錄影帶作為證物，但因為要「搵食」，所以不會在法庭上作證，這位大狀就判斷這錄影帶無法上庭。後來我們有一位朋友知道這件事，他介紹一位資深大狀給我們，與這位資深大狀見面，他說可以放心，他一定可以拿錄影帶上法庭，之後四五行動內部就是否聘請律師這個問題進行正式討論。

929當晚有記者訪問主流民主派的那位身為資深大狀的領導人，這位領導人認為警方的處理是正確的，他後來才被迫放棄這個言論。另外支聯會開了一次大會討論929的事件，我和當時革馬盟的第一把手開會前找支聯會另一位領導人（他當時還是教協的第一把手），我們在教協某一個房間內討論，他不肯支持我們。當時自己認為一定會入罪和坐監，我和白頭佬在同一間中學教書，我在十二月開始審訊，校方已不再編一月開始的課給我，因為預料我一定入罪，我們完全預料不到會是無罪的。我們對支聯會那位領導人說：「我們會不會入罪是小事，假如我們入罪會大大打擊目前的運動，支聯會支不支持我們？」他拒絕支持，之後我們從教協寫字樓行到禮堂開支聯會大會，怎知所有會眾都說要支持我們，所以支聯會最後支持我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不是支聯會的領導支持我們，而是他們被會眾所迫而不得不支持我們，當晚說警方處理得對的那位領導都不能再說警方是對的了。你可以看到主流民主派與當時的左翼，大家都知道存在路線上的分歧，這次事件再一次體現了大家的分歧。

929對四五運動內部是很大的事。

(劉：警方在929後曾到電視台搜證。)

對，警方曾到兩間電視台搜證，後來他們沒有採用電視台的畫面，因為電視台拍到的對他們無用，如果吳仲賢的說法屬實的話，因為電視台其中一個編輯是吳仲賢的朋友，他跟吳仲賢說他們拍到打人的畫面但不會播出來，如果是真的話，即使警察搜到也不會拿上法庭。

最初關於請不請律師我是沒有立場的，四五行動當時大概有八十人，我們懷疑有兩、三位是警察的線人，有一次開會其中一個拿著一個很小的懷疑是錄音機的器材，我們立即追問，所以關於929的處理，有人在大會建議交由常委會全權負責，事後才向大會公佈，這建議獲得通過，所以就交由常委會全權負責。我於2001年退出運動後，有一位前同志（下面稱他作A君）不止一次向別人說我被捕後就退出了，我想不到竟然會有人這樣刻意中傷我。無論如何，當時的確有一個人於整件事後退出了運動，這是當時革馬盟的第一把手，他是常委但沒有參與有關討論，全權交給其他人去處理，所有討論都沒有出現，事後亦退出了四五行動。我們是覺得很詫異的，可能因為他的健康問題對他的打擊很大，所以事實上是有主要成員因為被拘捕而退出的，但這個人不是我而是當時革馬盟的第一把手，所以是比較諷刺的，因為A君也是革馬盟。

就請不請律師這問題分成兩個意見，一個是請律師，主要原因是代表我們的律師有把握可以將錄影帶呈上法庭，而錄影帶能呈上法庭非常重要，當時沒有人想過是會無罪的，所以這個意見不是認為真的可以脫罪，而是認為我們被入罪會對運動造成打擊，所以我們應該盡力避免發生這個情況，關鍵是必須將錄影帶呈上法庭，我是屬於這個意見，革馬盟的第一把手也支持這個意見。所以他跟另一位常委說：「一切交給劉榮錦負責。」因為我是常委會召集人，跟我持相同意見的人都主張交給我處理。另外有兩個人持相反意見，一個是A君，另一個是新進的年輕人（即是那個罵我想搞論政不搞鬥爭的人），這位朋友認為粗暴、無禮才是

無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裡我們稱之為「流氓無產階級」，這兩位朋友的意見是不請律師，常委會多數意見認為要請律師，通過後就要執行。

我們的代表律師輩份比較高，按常規輩份高的資深大律師會帶同一位資歷較淺的大律師一同出庭，這是英國法律傳統，所以一共有兩位律師。這位律師建議我們七個被告中，他代表其中六個被告，另一位律師就代理餘下一個被告，理由是辯方可以向控方證人盤問兩次。我將這個建議帶回常委會討論，常委會同意，但問題是代表誰？當時年青人建議代表A君，因為他是公開的革馬盟，而外界不清楚其他人的身份；這個建議是那個年輕人提出的，其他人都接受，所以資歷較淺的大律師就代表A君。最終錄影帶可以呈上法庭，原來法庭很講究輩份，因為這位資深大律師輩份高，所以控方律師及法官都沒有反對錄影帶片段作為證物，我的判斷是因為有這條影片法官才會判我們無罪，因為當法官一邊觀看這條影片時，一邊數著警方在樓梯內用警棍打我的次數（兩次），我望著法官數手指，最後判了我們無罪，出乎了我們意料之外。

判決後我們回到四五行動大會進行檢討，因為之前大會決定將整件事交給常委會秘密負責，事後才向大會報告。在訴訟期間，通過請律師的決定後，有關責任都放在我身上，所以兩位持不同意見的成員之矛頭直指向我，鬥爭相當激烈，他們把策略問題上升到路線的高度，名符其實是無限上綱。後來在檢討大會上，我才知道那兩位.....當年我在中學教書，他們兩人無業，經常跟其他成員喝啤酒，對他們說：「你們去問劉榮錦，為何資歷較淺的律師會代表A君而不是代表劉榮錦？」他們的意思是我陷害A君，所以才安排一個實力較低的律師給他。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直到在檢討大會上有人質詢我才知道這件事，我說決定以資歷較淺的律師代表A君不是我的意見，是那位年青人的意見，然後得到常委會通過的。那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我第一次親身感受權力鬥爭的殘酷，這件事對四五行動的打擊更大，本來我們大概有八十人左右，檢討大會後超過一半人退出了。過去曾經有「藍帽子（警察機動部隊）」包圍我們的會址都打不倒我們，竟然是我們內部自己打自己，令四五行動失去一半人，所以這件對四五行動的打擊真的是很深。

所以929事件的兩個最值得提起的是：一）原本主流民主派的兩位最高領導人拒絕支持我們及，二）四五行動內部受到的打擊。事後有一段時間我完全不與那兩位成員交談，但是朋友是可以選擇的，同志無法選擇，因為同屬一個組織，雖然用了那麼卑劣的手法，但我仍然要跟他們一齊工作，除非是我或他們退出組織。

(葉：你在七十年代末有出版書籍？)

我八十年代中旬出過兩本書，一本中文一本英文，其實兩本內容一樣，只是中英文版的分別，就是兩篇長文，一篇寫俄國革命的墮落，另一篇是為何計劃經濟跟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的基礎）可以並行不悖，為的是要解決理論的問題，這兩篇長文加起來有十多萬字，所以編輯成書，先寫英文版本寄去外國組織。後來我在929之後出版了另一本書（是學聯資助出版的），是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去探討蘇聯與東歐事變，為何一個統治階級會自行退出歷史

舞台呢？這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問題。這本書的流通比之前那兩本廣泛，最初兩本書出現在香港沒有太多運動，較靜寂的時期，目標主要是理論探索，所以很少人會留意，至於蘇聯與東歐事變那本書，有人知道四五行動的人出版了這本書，加上在蘇聯東歐變天的脈絡下，所以那本書受到較多關注；另外我有為1984書局及盧森堡派的刊物寫英文文章。

(葉：最初那兩本書的書名是甚麼？)

中文的叫《共產主義綱領界說二篇》，圖書館未必找得到，反而1992年出版的《「紅」色的轉折：蘇聯東歐變向》可以找得到，因為當時有編輯幫我排版，登記有書號，所以比較正規，至於《共產主義綱領介說二篇》是很少的流通，沒有出版社的，讀者主要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感興趣的人，例如可能有少部份革馬盟或十月評論的人會閱讀，主要都是在書店售賣。其實那是指導實踐的理論問題的釐清。英文版叫“Two Texts for Defining The Communist Programme”，寄去外國（如盧森堡派、布哈林派、意共組織），我記得我曾寄去英國的Capital and Class，主要是寄去一些曾經有過討論的組織。

(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有香港前途問題，你有沒有參與討論呢？例如你提及那個當年在《學苑》做過編輯的那一個人，他在面對前途問題時專門找了一些朋友在某些輿論陣地（如：《信報》）寫一堆文章，去反對一些「維持現狀派」。你有沒有參與這個討論？)

我沒有參與主流民主派或那位總編輯的討論。那位前《學苑》總編輯屬於社會派，如前所述，他們走體制內路線，而我自己及書局的朋友走體制外路線，所以對他們所搞的活動不感興趣。若干年後，就自己當初把體制內和體制外作出如此絕對的劃分，覺得是屬於左傾幼稚病（列寧語），但當初就是經歷過這個階段。就九七問題，我的立場很簡單，如果是從帝國主義的高度，一定是支持回歸。支持回歸不是支持中共政權。對托派來說，因為他認為中國是一個變型工人國家，所以他支持回歸。不過革馬盟內部有人因為支不支持回歸這個問題而退出的，寧願維持殖民地統治，因為他們認為維持殖民地統治比回歸更好。內部成員因為回歸問題而堅持不了立場，寧願維持殖民地統治，既然組織的立場是支持回歸，所以就決定退出了。過去中港台問題為香港托派帶來了幾次震盪，這是第一次。你提及到那位學苑的總編輯，他好像是支持回歸的。

(葉：那位總編輯為了批評那些「維持現狀派」，所以專登在《信報》寫了一堆文章反擊他們，後來他們更編輯一本文集《反調》。)

我記得他們《文化新潮》內有一篇文章寫「中共是一個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我記得我是在中學的教員室裡看到的，我還跟白頭佬說：「有沒有搞錯？Necessary Evil？」我意思是，Necessary Evil是沒法子的意思，而非從理論的高度來看待中共。

我對社會派.....我不是經常讀《信報》的文章，除了因為他們走體制內路線外，還另外有一個原因。我記得他們在《信報》用一些很粗俗的方式去講馬克思主義，我覺得這是矮化馬克思主義，你可以用容易淺白的語言，但容易淺白不等如用粗鄙的語言，我不喜歡粗鄙的語言，所以不是經常讀他們的文章。

(葉：你在參加四五行動時是相當活躍，但參加四五行動之前的八十年代，你都有參加過革馬盟的活動？)

基本上都是幫他們派傳單，例如團結工會事件、營救劉山青，其實八十年代上半期是很靜的。

(葉：八十年代比較重要的，例如吳仲賢有參與的地鐵工潮？那是他在內地被捕之後的一次，有人甚至說那是他最後一次參與的社會鬥爭。)

那一個我沒有參加。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是革馬盟搞地鐵工潮鬥爭的。當時1984書局班人並沒有什麼正規組織，但卻有一些自發而非正式的一種可以說是「分工」。我們其中幾個人較為活躍躍於行動，可謂感性先行，其他人便把他們的行動當作為「代表」書局的參與。記得他們介入佳視工潮頗深。地鐵工潮他們大概也「代表」了書局介入，但記憶比較模糊。

我第一次幫革馬盟派傳單可能是1980年團結工會事件，後來幫他們派了不少次傳單。我當時跟一個公開身份的革馬盟成員很熟絡，都是派類似「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的傳單，後來區議會選舉，我跟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派傳單，呼籲市民不要投票，總括來說八十年代上半期香港的運動都是很寂靜，而我主要是釐清指導實踐的理論問題，同時我集中跟外國組織進行聯繫和討論。

葉：你跟外國團體（如：社會主義工人黨、盧森堡派等）的關係是怎樣的？是思想上的共同性？大家會有共同的理論問題？他們是組織，而你是個人，你和他們關係是如何？

當時我是半代表1984書局，何謂「半代表」？即是以1984書局的地址作總部，但書局多數人對深入討論理論性的東西不大感興趣。有段時間我跟白頭佬一起做街頭劇，你知他很喜歡做街頭劇，我曾跟隨他們到中文大學做話劇。我跟外國組織進行恆常性聯絡的時候，基本上是每一個月與盧森堡派及意共左翼通信的（當年還未有電腦，用打字機打字和改錯字，很花時間），我曾參加過他們的國際大會，意共左翼有一些工會基礎，我跟隨他們探訪過他們在公交工會的干部。我雖然是比較傾向這些組織，但我有很多理論上是不同意；例如盧森堡派，他們以羅莎盧森堡經濟理論為基礎，我覺得他們的經濟理論是錯的，他們曾好幾次來香港與我討論，所以很多時間都放在討論上。

(葉：所以你的文章也會在他們的刊物出現？)

有英文文章。有時他們開會的時候，我也會寫一些文件給他們，當作是一個討論上的意見。但我沒有加入他們，有一次我在倫敦跟意共左翼一派聊天喝酒，我有一個感覺是私人上跟他們不是太投契，當然話題主要圍繞政治，我當時想：「難道我要跟他們在以後的數十年一起鬥爭？」其實我是感受到隔膜，但是同志沒有得選擇，所以馬克思主義中文化因素與階級因素到底哪一個更基本？我當時感覺到在文化上大家有很大隔膜，片刻想到，階級因素到底是否最基本？文化因素可能都重要。

(葉：你剛才形容自己是解放馬克思主義者。)

你如果需要標籤的話，可以這樣歸類我。

(葉：你說自己是獨行俠，其實香港有沒有類似你的人？不一定政治觀點要跟你一樣。)

當時有一些個別人士聯絡我，我記得我當年出版過幾份刊物在學生會裡寄賣（基本上是送的），有些大學生閱讀後有和我討論，但是很少數。

(葉：因為我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用「解放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號稱呼自己。)

如果你要我給自己一個標籤，那就是「解放共產主義者」，其實這個名稱是白頭佬告訴我的。

(葉：會不會白頭佬年輕時都自稱「解放共產主義者」？)

他素來都是無政府主義，最初我「代表」1984書局做對外聯絡的時候，他跟我說這一班人是「解放共產主義者」，然後那一派又是甚麼……所以我第一次是從白頭佬得知「解放共產主義者」這個詞，所謂「解放共產主義者」的一個意思其實是不屬於第四國際的左翼。第四國際至今仍然存在，我仍然會收到一些說要改革第四國際的組織寄給我的刊物，雖然我沒有細讀，但也會翻看一下。

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週報叫"Socialist Worker"，是報紙形式；月刊叫做"Socialist Review"，是一本雜誌形式，然後季刊是"International Socialism"。現在社會主義工人黨跟香港的新苗不只熟絡這麼簡單，以我所觀察他們與這一派是緊密合作，我還有看社會主義工人黨寄過來的月刊和季刊。

(葉：上次我們訪問區龍宇時，他描述目前的新苗都不太運作了，他可能較多的活動在左翼廿一，或是觀點比較多，但不一定政治立場或思想相同，但都是廣義的左翼。)

我認識的托派組織是一個核心，即是黨，然後有外圍 (front organization)，很多參加外圍組織的都不是正式的成員，可能純粹是參加的而不知道最活躍的成員背後可能是有黨的。這是托派組織，甚至由第三國際開始都是這樣，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葉：他的形容新苗絕對稱不上一個黨，甚至覺得是一班熟的朋友，好像一個讀書會(Book Club)的形式。)

下次我會講新苗的發展，因為跟我離開運動之前的政治鬥爭，都會涉及到他們的，因為我都想解釋為何我會離開運動，第二就是我為何不再視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出現了甚麼問題？到時都會約略涉及，雖然我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亦已退出政治，但觀點上我仍然站在左翼的角度，我會根據我對馬克思主義及左翼的認識，講我認為在今天的香港，一個左翼所應有的立場。另外，我會講到目前仍然活躍的托派（基本上只餘下兩派，一派就是新苗，另一派是十月評論），而十月評論所謂活躍的意思是：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出版，但幾年前我仍見到他們出版。其實十月評論最有資格去寫早期托派的歷史，為何我說早期呢？因為最低限度自八十年代開始，他們的鬥爭實踐極為有限，故沒有條件去寫運動的歷史，但他們最有耐性搜集資料，所以他們有可能仍保存過去四五行動的單張，我相信他們也齊集了四五行動的出版刊物。

(葉：有沒有《十評》的人可以介紹給我們做訪問？)

關於《十評》我只可以告訴你一個人的名字，因為他是公開身份的。當然我知道其他人，就算私下我也不方便講，因為你們之間可能是認識的，如果他要表露身份就一早會告訴你。這個十評的人，不注重思想上的東西，他當區議員一段長時間，革馬盟的人經常說他做區議員像打份工般，不進行鬥爭。

如果你想找《十評》，我都不明白為甚麼他們如此秘密，我印象中只見過他們一個「老鬼」，新苗這一派的老鬼是向X，他們很秘密的，但為何要如此秘密呢？內地都釋放了托派的人，革馬盟的精神領袖是雙山（王凡西），另一個精神領袖是鄭超麟，他十多年前已經放監，基本上大陸政府都不覺得托派有威脅了，尤其是在香港，完全不明白為何還要這樣秘密。

(葉：區龍宇的講法是幾十年前，即七十年代的時候，他已經覺得那些老人家太秘密，例如開會都要找非常隱密的地點，所以非常不滿意，後來較年輕的托派就自己出版刊物。)

他是新苗的精神領袖向X的大弟子，我不清楚他們為何不滿意革馬盟。

(葉：我都想問你這個問題，他和革馬盟的其中一個理論上的分歧是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在第四國際裡對世界革命的形勢判斷，覺得革命的形勢是相當高漲，但是要盡快投入這場鬥爭，但他們作為當時還在革馬盟內的團體，他們的背景又其他人不同，例如跟吳仲賢的關係不是太強，他們認為革命形勢並不如他們想像中好，也不應該如此樂觀。區龍宇他們當時有一種判斷，造成革馬盟內部的爭論，他覺得這個爭論構成了他們最後離開革馬盟的原因。你對當時的爭論有沒有印象？)

對，革馬的人曾告訴我他跟吳仲賢關係不好，但我不知道（或已記不起）他們有這個爭論，初時只認識革馬盟幾個人。但是當時認為革命形勢高漲不只第四國際，我接觸的盧森堡派，亦有同一個判斷，後來受到很大打擊，但是你說新苗這一派的人是這樣看，我一、兩年前曾經質詢過他們其中一個人，似乎他們永遠都覺得形勢是差的，所以我說他們是合法馬克思主義就是這個原因。例如當年四五行動的時候，當時的形勢在上漲中，但他們說如果警方提供牌照的話，一定要接受，否則我們所有人會被捕。總之，我的經驗是他們經常判斷形勢都是不利的形勢。

(葉：其實我做學生的年代都被他們罵過，即是90年左右，當時我們經常去新華社及與警方發生衝突，試過有一次發生了比較大型的衝突，後來更佔了一條馬路。結果第二天他們在報章撰文批評我們，我印象很深刻，他們是經常覺得別人冒進、盲動。)

若不是你提起，我基本上已忘了「冒進」一詞。當然有時有冒進、盲動的情況，四五行動正式成立時，十月評論想回來，我都錯判形勢，可以這樣說我當時否決他們的建議都是盲動，雖然這不是鬥爭的盲動，而是內部鬥爭的行動，但都是屬於盲動。不過，我認識的他們都是「形勢不好、不要盲動」，所以這到底真的是判斷還是他們的特性呢？我跟區龍宇不太投契，我記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個電話：「收Fax！」我認得他的聲音，就是「告別衝擊文化」這篇。我跟他們另外個別人士比較投契，但很久沒有見面，一、兩年前見過面，目前在左翼廿一非常活躍。

第二部份：新機場事件·香港回歸·離開運動（劉榮錦）

【標題為編輯所加】

受訪者：劉榮錦

訪問者：葉蔭聰、劉麗凝

訪問整理：劉麗凝

上次我談過 9 2 9 審訊最終判我們無罪的主要原因是錄影帶，我回想我覺得另外一點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最初跟警方有一個協議，就是銅鑼灣的（舊）世貿中心，即怡東酒店的那一座，我們協議在東北角有一個細小的空位進行示威，但未出百德新街就已經截停我們，當日的現場指揮官貝利是外籍警司，他的一個助理陳警司作證時，我都有點意外，他自己主動承認當時有這個協議，但是去到百德新街口，他的指揮官就不容許我們繼續行，這也可能是判決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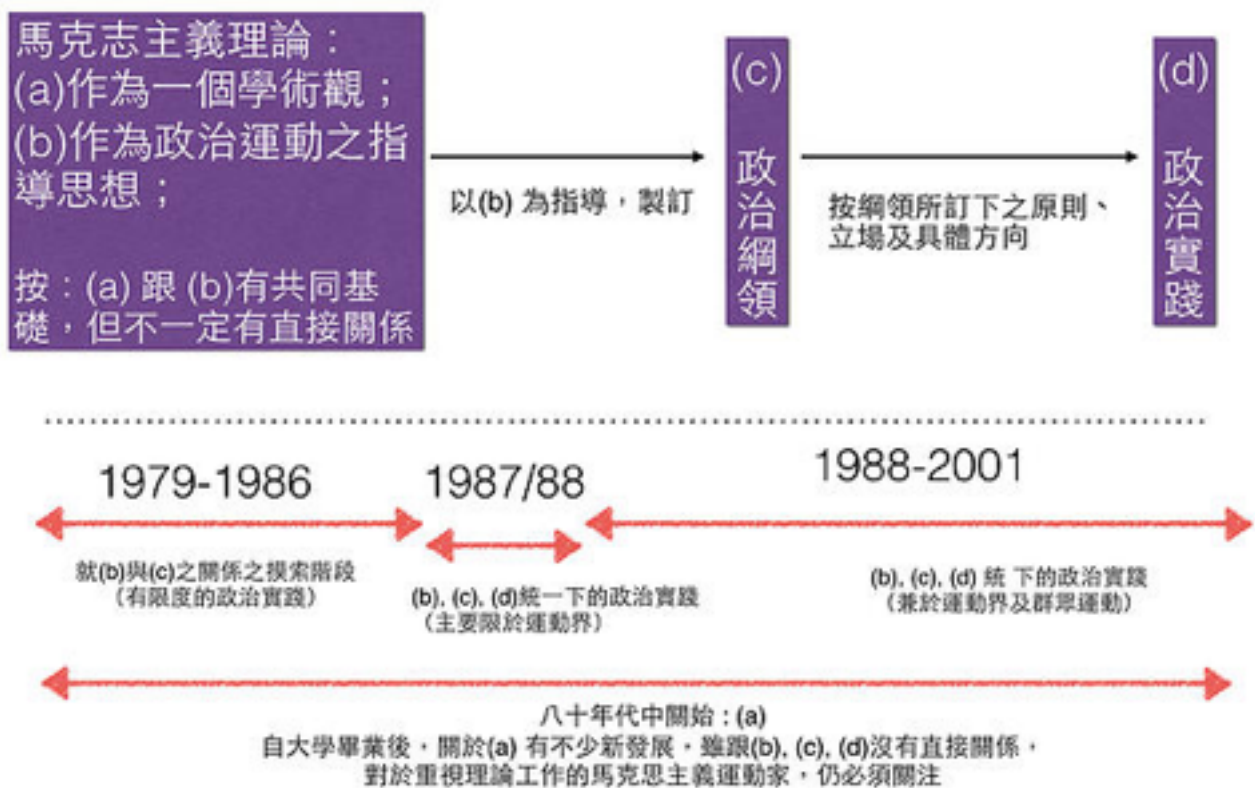
第二是 9 2 9 的檢討，我說過這個檢討對組織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再回想一下，革馬盟也可能是因為那次檢討的鬥爭而瓦解。因為四五行動是革馬盟的 front organization，所以四五行動早期，直到 9 2 9 之前，他們都有開革馬盟的會議，即是黨開會去檢討這個 front organization 的進展，9 2 9 檢討之後革馬盟好像沒有再開會了，原因是我們有七個被告，不計那個年輕人，六個人裡有三個革馬盟的領導人（包括革馬盟第一把手），另外一個是革馬盟的友好人士，還有一個沒有背景，是一個技術工人，所以真正的檢討鬥爭其實是革馬盟裡其中一個人（即 A 君）與年青人所代表的意見，另外幾個人（包括其餘兩名革馬盟的人）屬於相反意見。為了前述的原因，都是由我出聲，但其餘兩名革馬盟的人也看到或知道（如上的述，革馬盟第一把手自己沒有出席討論，是由別人告訴他的）鬥爭的殘酷情況，所以以我所知，因為「牙齒印」太深，之後革馬盟沒有再開會了，所以我覺得革馬盟是因為那次事件後完蛋的。如果你有機會訪問革馬盟的人，你可以問這段歷史，這是我的理解。

另一個我要補充的是主流民主派，他們是香港本位利益主義，他們一直都不涉獵國內的情況，但後來終於與中共決裂，這是被迫的。你可以翻查報章，在六四之後支聯會於九月十二日舉行「百日祭」，他們曾經發出一個通告給所有屬會，要求一定要用大會的口號，不能用獨立的口號，而大會將「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刪去。我們都有去參加百日祭，結尾的時候我們因為支聯會禁制我們的口號而感到相當不滿，當時百日祭參加的人數不多，坐不滿三個球場，我們坐在接近糖街的球場，自己開了一個集會，結果約有一百數十人參加我們的集會，我們是集會中的另一個集會，你可以翻查九月十三日的報紙可知悉當年的情況。支聯會百日祭顯示如我上一次所講，他們最初是被迫與中共對抗，然後於六四後再思考，發覺有需要保留與中央維持關係的空間，故此刪去「結束一黨專政」這條口號。後來中共開除了主流民主派中兩位基本法籌委的身份，所以是中共採取主動與他們決裂的，而非他們自己的抉擇。當時接著是蘇聯與東歐崩潰，我與一些海外民運人士都有聯絡，也密切關注他們出版的刊物，當時他們以為中共一定會在短期內倒台，這些海外民運人士也設計了新的國旗和國歌。

(葉：中共會倒台的說法我是有印象。)

例如你看看歷史較長的《中國之春》、《百姓》都可能有報導這些消息，所以當時香港主流民主派被迫走上與中共決裂的不歸路，而他們也相信中共倒台指日可待，所以中共與他們決裂他們亦無所謂，後來才發覺發展不是這樣。中共與主流民主派的完全決裂是在這背景下發生的，百日祭顯示他們當初並沒有決裂的打算。

還有我預備了一個圖表，可以解釋得清楚一點。



這個圖表分兩部份，上面是圖，下面將我本人的歷史套上去。

首先是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我分 (a)、(b)，(a) 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學術觀，(b) 是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運動的指導思想。(a) 和(b) 有共同基礎，但不一定有直接關係，(a) 所涉及的議題常跟 (b) 沒關係。你如果是搞政治運動的話，是以(b) 為指導，制定一個政治綱領(c)，所謂政治綱領，例如是托派的話，如果蘇聯與美國發生戰爭的話，他們會站在蘇聯那邊，政治上批評蘇共，但軍事上支持蘇聯，這是一個政治綱領；例如你進不進入英國的工黨？

如果你進入就是當時的政治綱領，你是以(b)為理論基礎制定政治綱領，然後是按(c) 政治綱領訂下的原則、立場和具體方向進行(d) 政治實踐，這個圖很重要。

補充上一次的訪問，第一就是我去到87、88年，我成為大半個托洛茨基主義者，我跟當時的托派有甚麼分別呢？就是由 (b)去到(c) 再到 (d) 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他們認為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這是(b) 即理論），如果美國與蘇聯打起來的話，他們會在軍事上站在蘇聯那一邊。但因為我不認為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我認為蘇聯二次大戰後是帝國主義，如果美國與蘇聯打的話，我不會站在任何一邊。這就是理論如何通過綱領指導實踐。但是如果中國跟美國打就不一樣，雖然我不認同中國是變種工人國家，但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延續，所以政治上我會批評中共，但軍事上會站在中國那邊，如果只是中美之間有關的，我和托派當時的綱領和實踐是一樣的，但如果與蘇聯有關就有分別了，故雖然我是大半個托洛茨基主義者，但我不是托派。

(葉：你的觀點有點像中蘇交惡後，中國或毛澤東去判定當時的蘇聯。)

即社會帝國主義，事實上我是同意，因為我不認同蘇聯是一個墮落工人國家，二次大戰後他們進駐東歐扶植衛星國家，從托派的立場覺得這是進步的；從我的立場來看我不覺得這是進步，因為這是帝國主義的擴張。這是我和托派的分別，因而如果涉及這些實際問題的話，大家的政治綱領和實踐也會有差別，但是當時對我們有關的政治實踐都關乎中港台問題，因此這些方面我和托派綱領和實踐上沒有分別。這解釋了為何一個80%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却不是托派的原因。

這個圖（下半部份）是我個人回想當年，1979年至1986年我就 (b) 和 (c) 的關係處於摸索階段，始終我的出身是知識份子，大部份參加運動的人一開始便認同綱領，至於由 (b) 如何推論到 (c)，我覺得很多人都不是太清楚，而我很重視 (b) 如何推論到 (c) 的過程，所以我會形容當時是一個摸索階段。當年的政治實踐相當有限，我與白頭佬做街頭劇，或是參與「北京之春」派發支援傳單等，但我的焦點仍是放在 (b) 跟 (c) 的關係之摸索。

1987年至1988年上旬，我基本上已經完成把 (b)、(c) 和 (d) 統一起來，即如何由 (b) 推到 (c) 再推到 (d) 的過程，當時政治實踐主要限於運動界，未有真正的群眾運動。由1988年下旬開始直到我退出運動，在(b)、(c) 和 (d) 的統一之下，我的政治實踐兼及運動界和群眾運動。可以從這個圖表大概了解我的個人發展。這個圖表還有 (a) 的部份，當然很多運動界的人對 (a) 完全不感興趣。但馬克思主義作為學術觀，在我離開大學以後出現了幾個重要的新發展，例如“Brenner debate” 關於資本主義興起的分析，涉及唯物史觀，另一個是政治經濟學有關價值理論的爭議，我印象中不計我自己，當時香港只有曾澍基一人研究過這個問題，因為我有一次跟他聊天時所以知道。

(葉：我記得曾澍基做過一本左翼評論，有些文章是討論你所說的問題。)

我記得《左翼評論》應該沒有討論過有關價值理論的爭議。你知道曾澍基在英國讀經濟學，有一次我跟他聊天講到價值理論的爭議，其中兩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一個叫做 Ian Steedman (曼徹斯特大學)，另一位紐約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的 Anwar Shaikh，我曾有段時間打算去紐約跟 Anwar M. Shaikh 讀書。曾澍基告訴我他曾經申請過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因為很有名，但最終不成行，所以去了英國跟 Ian Steedman，曾澍基說對 Ian Steedman 很失望，所以我知道他花了很多心機研究價值理論的爭議。我估計當年的運動界也不知道有這些東西，但那是很大的挑戰。「新李嘉圖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挑戰，如果成立的話，會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缺口，作為一個政治運動的指導思想都會發生問題，所以八十年代中開始我亦同時在學術層面留意和思考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新議題。

929 之前，八九民運結束後，我寫了一篇長約二萬字的文章《八九民運初步總結與前瞻》，我相信這篇文章是全球最早在馬克思主義運動裡面，從理論角度分析八九民運，如果搞馬克思主義政治運動，一看到「總結與前瞻」就知道是以不斷革命論的角度來分析，因為托洛茨基寫不斷革命論的其中一本重要的書是《回顧與前瞻(Result and Prospect)》，我約略講解裡面的分析，因為這與政治實踐很有關係。在八八年、八九年頭發生學運之前，我們早已留意到當時的異議分子思想上與「北京之春」是很不同的。從五十年代到北京之春及與王希哲，幾乎每一個民運人士都是支持社會主義的，但是八八年我們已留意到當時的學生及知識分子（如方勵之）覺得美國是最好的，而不是支持社會主義的，即他們是支持民營企業家階級（新興的資產階級）。

(葉：當時有人要求全面西化。)

沒錯，例如劉曉波，學運期間我們在香港搞運動，沒有太多時間去分析他們。學運期間我有剪報，但沒有時間閱讀和整理，運動結束後，我趁暑假（七、八月期間）花了一個月寫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提出學運領導（主要是XX及YY）的綱領其實是一個民營資產階級的綱領，所以XXX才投放了大量資金。如果這個領導的綱領是一個民營資產階級的綱領，你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到底要不要支持這個運動？這是很大的問題。我舉一個例子，台灣有一位左翼作家陳映真，他最後是支持鎮壓的，因為陳映真傾向馬克思主義，當他再細心回想這個運動的時候，如果他跟我的觀察是一樣的話，他可能便會這樣想：既然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運動，所以鎮壓它是理所當然，所以到最後他支持了鎮壓。

在香港，不知道是否因為看過我這篇文章，托派其中一派（新苗）接受「政治領導是資產階級」的論點，不過他們在政治實踐上支持這個運動，但這却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如果你支持運動，豈不是跟你的政治綱領矛盾嗎？因此新苗就更改自己的政治綱領。當時我有跟他

們的聯繫不算密切，但我會讀他們的文章，我忘記了確實的日子，總之有一次我看到他們一篇文章，說中國已由一個變型工人國家，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這過程剛剛是於1988年完成的，你說是不是太過巧合呢？如果中國已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便不需要理會被鎮壓的是以代表民營企業家階級利益為目標的運動。我在上述圖表已經解釋過，應該由（b）推到（c）再推到（d）。但他們剛剛相反，因為他們有（d）的實踐（支持八九運動），故他們需要更改（c），因而也需要更改（b）。這是本末倒置，亦是新苗為了把自己的政治實踐合理化，因而反過來更改自己的理論和綱領的做法之第一次；後面我還會講他們之第二和第三次。

(葉：你寫完這篇文章後，他們才改變理論？)

是隔了一段時間，我想他們一定看過我這篇文章，新苗前後三次倒轉過來改變理論，這是第一次。

在四五行動裡，革馬盟沒有面對這個問題，沒有討論。就我自己而言，八九運動這個領導你要反對和批判，因為他是一個新興民營階級的綱領；但當時很多參與運動的群眾是不知道的，群眾其實是對獨裁統治本能性的反應，他們因為學生絕食而走出來，所以你要支持群眾的基本意識，但要批評領導，這是我基於自己的分析而決定的立場。

(葉：我後來見到你在港大那篇博士論文都是寫相關的東西。)

對。我寫了這篇文章後就發生9 2 9檢討，所以四五行動沒討論這件事，之後又發生蘇聯東歐巨變，我當時覺得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重大挑戰：一個統治階級為何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你如何從馬克思主義分析這件事？我用了一年多寫了一本書，叫《「紅」色的轉折：蘇聯東歐變局》，港大圖書館可以找到。寫這本書使我想再做學術。於是我返港大。我最初讀社會學，但當時社會學系的學者都是我的師弟，我不願意師弟做我的導師，後來我走到政治系，目標是寫托洛茨基主義如何面對和分析蘇聯東歐的變局，可是政治系的老師不熟悉這方面，不過他們願意取錄我，我和導師談了幾次後對他都不太有信心，後來跟John Burns談，他建議我不如寫北京運動，所以我就寫北京運動了。我就是將上述文章作為博士論文的基礎，我對這篇文章其實是滿意的（即使現在可能會作出修改），基本上很多分析是準確的。

(葉：你的博士論文最後有出版中文版嗎？)

無論中英文也沒有出版，John Burns很喜歡我的博士論文，oral defense一個字都無需修改便通過，他經常叫我出版，但我仍然很希望先訪問一名幕後的關鍵人物YY，後來我放棄了出版的計劃，因為我寫這篇論文使我踏入了中國研究的領域，我做中國研究時也出版過一些文章。

(葉：都是英文為主的。)

對。不知你們清不清楚中國研究的始源。地區研究一般都跟情報有關，Said講東方主義也提及這點。所以在中國研究中，很多著名西方漢學家跟外交部／國務院關係很密切，中國研究裡最重要一份學報叫《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的一個前總編輯就是外交部的衛奕信，你就知道關係有多密切了。我在中國研究的領域做了一些研究後，我不想再做下去了。例如《中國季刊》不喜歡刊登太多理論的文章，他們著重實證，因為這些都是情報。有些著名漢學家跟外交部關係很密切，例如Susan L. Shirk，她曾經做過美國副國務卿，然後回大學再到國務院工作，另一個叫做XXXX 是卡達總統高級顧問團的主席，我自己不接受這樣，所以後來也不再做中國研究，亦都打消了出版的念頭，學術上就回到主流社會學。基本上我仍然覺得自己在學術上是左翼，稍後我會解釋。

(葉：你是如何認識白頭佬？)

早在大學時認識的，我在香港大學讀書時，他上來參加研討會，朋友介紹認識的，我對他印象很好，不過後來與他有很多爭論，但是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我很尊敬他，雖然後來大家意見不同，始終是一個我尊重的人，現在已經很少見面，但有一段長時間大家在同一所中學教書，而且我和他一齊做過很多街頭劇。我初初上書店的時候他身在外國，回來後將外國的經驗告訴我，是一個在運動界很深資歷的人。有幾位運動界的人我當時是相當尊重的，他是其中一位。

89之後就是新機場事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我上次解釋過我不會完全否定中共，托派也絕對不完全否定大陸，所以我們的政治綱領是香港問題是一個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的伸延的問題，所以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應該用一個萬事都反中的立場。新機場事件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嚴峻考驗。革馬盟裡有成員在中英談判期間受不起這個考驗，寧願維持殖民地統治也不願回歸，所以自動離開革馬盟。新機場是第二次考驗，當時新機場計劃提出的時候，中共反對這個計劃，全香港除了親中人士外，沒有人發聲表達反對的立場。

(葉：我們做學生時也有抗議，只有幾個學生，加起來只有十人左右。)

你要留意我們不是反對要起新機場，而是反對當時的選址，當時的顧問報告提議四個選址，赤鱗角排名最尾，政府將這個新機場建在赤鱗角需要一千多億的費用，當時一千多億是非常厲害，這明顯是要最後的「搶劫」，而赤鱗角選址最有利英資財團，最後將三份之二的合約批給英資財團，社會輿論亦嘩然，當時我們已表達了自己的立場，而政府就將英國財團的country of origin改為香港，說這些公司在香港已有一段長時間，故屬於「香港公司」。

第一個反對的人是誰呢？有一位區議員，我不肯定他是不是托派或革馬盟正式成員，就算他只是外圍，而不是正式成員，他也是密切的外圍。革馬盟的精神領導是雙山，這位區議員在英國的時候跟雙山很密切，他們稱呼雙山為「根叔」，若果他是革馬盟正式成員的話後來也退出了，所以新機場事件時他不是革馬盟。我和這位區議員的關係只屬一般，但遇到一個場合大家傾起來，他就發現跟我的立場是一樣的，我的立場很簡單：這是殖民地統治最後一場大洗劫。我們一定要反對，站在勞工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就一定要反對。大陸已發聲，我們不一定每件事都要反對中共的，在新機場事件上雖然與中共立場一樣，但作為左翼，即便政治上批評中共，你都要持這個立場。

這位區議員完全同意我所說的，不過他不擅於寫文章，於是他建議我起草一篇文章，然後跟他聯名刊登（但我放他的名字在前，這是草擬人所須遵守的慣例），我們兩人是唯一來自非親中陣營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新機場的人。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主流民主派那位大狀領導人基本立場是「借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力量來抗衡中共」，所以中共形容他是「民主抗共」。我經常說看待中共應以理論的角度為立足點，故中共的話不是一定要反對，他不一定是錯的。說主流民主派是「民主抗共」這句話就半點也沒有錯。過去政府曾經建議改革「校管會」，讓家長可以參與，但是這位大狀領導人反對，為甚麼爭取民主的人會反對校管民主化呢？南華早報曾訪問過這位領導，他說：「不行的，一定要反對，如果讓家長進入校管會的話，中共的統戰人士會湧入去校管會裡。」如果因為中共的統戰人士有機會入校管會，而反對校管民主化的話，這是很清楚的「民主抗共」。

當時主流民主派對中共反對興建赤鱗角新機場的回應是「中共干預香港的內政」，我這篇明報的文章批評，如果中共是干預香港的內政的話，英國人何嘗又不是干預香港內政呢？英國人上下其手就沒問題？大陸說這是殖民地政府想最後洗劫香港，這就是「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我就這件事件提出我的分析，然後我和這位區議員在明報發表文章表達立場。主流民主派一個核心智囊，這位先生現在成為了局長，他後來在經濟日報寫了一篇有關文章，我再撰文批評，我和他寫了幾篇筆戰，到最後我不再在文章提他的名字，因為經濟日報評論版編輯打電話給我，他說如果我再提他的名字就無法結束這件事。總之這個事件中，那位區議員是站穩在托派應該有的立場，站得很穩，並不因為中共發了聲，你就要站在英國那邊。

當時有一本雜誌《百姓》，我刊登了一篇《新機場的回顧與民主派角色》，這篇文章值得看的是在第二十四頁，當時《百姓》一位記者找我，這位記者現在也成為學者了，我跟她說你不相信的話即管去問主流民主派，他們有兩翼，一翼是社會民主比較多一點，另一翼由大狀領導，很清晰的「親英親美」，社會民主跟親美親英的那一翼是不一樣的。但因為那位大狀領導出了聲，於是社會民主那一翼就不敢出聲，不敢說跟他矛盾的話。我建議那位記者去訪問兩個組織，一個是職工盟，一個是教協，這兩個組織屬社會民主那一翼，問他們為何不就新機場事件表達立場。於是記者真的去訪問他們，而他們的回答真的是可圈可點，教協說自己不是一個政治組織，所以不會就這些問題出聲；職工盟李XX的答案就更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沒興趣」。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所以我在1992年四五行動的刊物中，寫了一篇聲明《香港政治格局及八九後的形勢》，從一個不斷革命論的立場去分析香港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為何會這麼弱？然後就講工人階級應如何行動。第一次把這個分析以文字發表。這

篇文章第十一頁講「香港本位利益主義」，第十二頁談「港人救港運動」是本位利益主義的清晰體現，接著第十四頁就是關於新機場事件的啟示，因為四五行動通過這個立場所以我才寫這篇聲明。原來當時學聯也有出聲。

(葉：有，就是我仍是大學生的時候，我跟學聯的人出去示威。)

所以當時能夠站穩左翼立場就是這幾個組織。我另外給你提供的這些是綱領性的文章，就是如何從 (b) 的理論制定一個綱領，下一篇是《關於香港未來經濟、政治形勢，勞動人民進行鬥爭的策略原則取向公開討論提綱》，是四五行動的提綱，是我草擬的，因為發覺臨近九七有需要重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綱領。

(葉：之前的文章都是刊登在《四五之聲》?)

《四五之聲》、《四五行動》和《四五評論》之類，都是我們自己的刊物。之前有關新機場事件的文章刊登在《明報》、《百姓》及《經濟日報》，那些屬於我個人名義的評論，不是任何綱領，雖然評論文章包涵了我的綱領，但包裝成為評論形式，所以報章才會刊登。但《關於香港未來經濟、政治形勢，勞動人民進行鬥爭的策略原則取向公開討論提綱》完全是綱領性的，所以沒可能會有報章刊登，你見到96年的綱領的第八點，講到不能一般性地「反中」，背後的理論便是不斷革命論，所以即使有親中勢力參加的聯合陣線也可以支持。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彭定康方案」。彭定康方案一出，主流民主派當時完全是喜出望外，當時我記得有一次劉X青約人開會，開會地點好像是借了吳仲賢住宅，學聯代表好像也有出席，另外一個是現在民主黨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是社會民主那一翼的，X青一開始就要求所有人支持彭定康方案，我就反對。我在《明報》寫了篇文章《緊握機會，利用港英的劣勢》，我的口號是「倒彭反殖爭民主」，當時與會人士個個贊成這個策略，總之是站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沒可能支持殖民地的末代總督。

我們於97年回歸前曾派發過一張傳單《戴卓爾滾回老家！殖民主義見鬼去吧！》，如果沒有這句口號就可能會忘記誰是作者，但是一見這句口號就知道是誰，那就是A君，因為這是他的招牌字眼。你可以看最低限度名義上，他仍是站在香港問題是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伸延的問題這個立場上，支持結束殖民地主義，跟內地人民聯合起來，這張傳單全部重申了。另外一篇小兵的《香港政權轉移與群眾運動的路向》都是A君寫的（小兵是他的筆名），當時站在「與國內同胞的結合」的立場，還有「香港群眾運動所必須揚棄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幻想，必須認識到香港的命運與中國的前途是分不開的。」

(葉：這些都是四五的刊物?)

沒錯，這些都是四五的刊物。關於九七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回歸當晚是否去示威？四五行動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和一些人的立場是：抗議六四的機會很多，結束殖民主義事大，所以當晚我們認為不應該去示威，如果當晚去示威的話，會給人一個錯覺是你反對回歸，即是反對結束殖民主義。A君認為一定要去示威，我記得大家最後是討論到不歡而散，沒有結論。當晚我有前往現場，那一晚下著滂沱大雨，我沒有示威，只是在外圍觀察，想示威的人就去示威，但四五行動因為這次是否參加示威出現了決裂。

這個決裂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事緣在97年之前A君說要去競選支聯會常委。支聯會是一個人民陣線，競選常委是不對的，以往我們都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旗幟，所以加入支聯會都只是低限度背叛自己的綱領，除非是用獨立旗幟去參選支聯會常委，如果不是我就反對。當時他去當了常委，當選常委後就很大問題了，他參與四五行動討論時我與他曾多次出現很大的爭論，我說：「好像你做了常委後變得經常為主流民主派那位大狀領導人辯護。」內地有句話相當精警，說「屁股指揮腦袋」，所謂屁股便是你在坐在哪個位置，而它就指揮你的想法，我跟他說：「我現在擔心你去到支聯會不只沒有舉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你現在似乎被他們同化了。」我在四五行動裡表達過不少次，不只是我個人意見，當時四五行動的領導班子所餘的人不多，亦不是全部人都認同我所講的，但認同我的觀察佔多數。

九七之後情況變本加厲，在四五行動裡關於某些事件的討論和立場，我的論點通常都是佔優的；因為A君的論點不能在四五行動裡通過(即是四五行動不會發起他所建議的行動)，所以他出去跟其他人合作，當中有國民黨的外圍，另外還有一些九七後才出現的年青人，這些年青人完全不喜歡討論。因為我曾經嘗試跟其中一位進行討論，我提出某些看法，他不高興，一句就罵過來，於是不再出聲，無謂浪費時間。當A君在四五行動輸了辯論，他就跟上述這些人做他們想做行動，但因為他形象突出，記者容易記認，所以傳媒的報導經常指他進行的行動是屬於四五行動。我們在四五行動提出抗議，因為那些行動並不屬於四五行動，但他的解釋是已經跟記者講了，只是他們照樣這樣報道，無論如何，我們四五行動內部有一個笑話：真正的四五行動與傳媒上的四五行動是兩套不同的班子。

以往報章傳媒經常以負面的態度來報道四五行動，但回歸前的一、兩年，我觀察到有兩份報章開始以正面的角度來報道及評論過往的激進反對運動，其中一份是南華早報，經常訪問A君，他是由那段時間開始馳名國際，這兩份報章的意圖是成就一個九七後的激進反對派。他玩南華早報的遊戲本身不成問題，前提是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綱領。回歸那一年他寫了上述兩張傳單，字面上都仍然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這原來只是假象。我舉一個他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的例子，他在2001年參與立法會選舉，當時我雖然跟他的立場已經對立得很，但是我仍然鼓勵他去競選，甚至是第一個捐錢給他，我將自己十份之一的積蓄捐給他（雖然不是很多錢）。當時四五行動已經無紀律可言，因為四五行動決議輸了後，他自行找人出去行動，所以我不能對他參選提出四五行動組織性的要求，但是我向他提出一些個人願望。

(葉：當時他以個人名義去競選？)

沒錯，他以個人名義去競選。我說我希望他站穩在九七年他所寫的傳單的立場。不要以反中為中軸，從中港勞動階級聯合的立場出發，但不久之後我發覺得他的情況完全不一樣，而我決定退出運動跟這有直接關係。

首先，我看到他一張競選漫畫，就是純粹以反中為中軸。然後我看到他與大狀參加同一場電視論壇，一位親中人士質疑為何這位大狀會跟美國國務卿及國防部長私人會面。我已解釋過，若果中共與美國發生衝突，托派應該站在中國這一邊，就是政治上批評中共，但軍事仍站在中國這邊，因此，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應該要批評大狀私會美國國務卿及國防部長。929事件時這位大狀竟然說殖民地政府處理恰當，我和這位大狀的立場永遠是對立的。在論壇上，當時的泛民陣營沒有一人為這位大狀辯護，唯一一個為這位大狀辯護的人反而就是A君。

我看到A君的競選綱領和實踐已完全違背了左翼的立場，於是就決定離開四五行動，甚至離開整個運動。在馬克思主義運動有一個詞叫「機會主義」，「機會主義」的意思是為了短線政治利益而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綱領。自從A君成為支聯會常委後，已經趨向機會主義路線，我在四五行動裡亦多次提出這個問題。我看到他那張競選漫畫及目睹那次論壇辯論後，我就沒有再出席四五行動的會議，而當時四五行動的會議基本上是他參與競選的會議。

我離開的時候我仍然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離開的原因是香港馬克思主義運動已經全面破產。就四五行動來說，這個破產出於它已被機會主義所壟斷。我當時已回到學院，就算以往在中學當全職教師時，都只能在公餘時間處理四五行動的事務。A君是無業的，可全職走機會主義路線。我覺得自己也力不從心了，沒有時間可以逆轉這個機會主義的發展。我離開後，四五行動裡跟我立場接近的成員後來也離開了。

之前跟我訪問的大陸公共知識分子跟我談時問我：A君常穿印有捷古華拉頭像的T-恤你有什麼感想？我說這是對捷古華拉的褻瀆。捷氏一生跟美帝作戰，A君在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上就中港問題卻充當跟美帝勾結的人之辯護士。

(葉：所以在他參選那段時間，有一批成員離開了四五行動？)

不可以說是一批，個別核心成員，不過四五行動的人已經不多，我基本上是因為這個原因而退出運動。從A君當支聯會常委到我離開，對A君的批評都是出於我採取主動，雖然我的批評一般都相對佔優，主動性始終在於我。故我離開後，便失去了這個主動性，而立場接近我的成員繼後亦離開了。

馬克思主義運動在香港已全面破產。本來香港馬克思主義運動包括托派三派，以及我這個獨行俠，四五行動因為機會主義抬頭而徹底變了質，革馬盟亦消失了，所以只餘下十評及新苗這兩派。十評擅長做文字紀錄，但我懷疑他們到底有沒有政治綱領，政治實踐他們差不多是零，談不上是一個運動；最後是新苗，八九民運之後他們因為政治實踐而改變理論，那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台獨抬頭的時候（九十年代中期），我記得A君當時跟我提起台獨，因為新

苗的精神領袖向X寫了一篇支持台獨的文章，他的論點是同一個民族不一定是同一個國家，例如韓國、德國，所以台灣獨立並無不妥。我記得A君取笑新苗本末倒置，若果美國和中國因為台灣打起來的時候，看看新苗會支持哪一方？他說新苗可能站在美國那一邊。站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綱領，台灣是帝國主義遺留下來的問題，所以一定要反對台獨，因為這是帝國主義的問題。因為新苗政治實踐上反對中共，所以支持台獨，因此他們便把自己的理論改變，把帝國主義從台灣問題刪掉，這是新苗的第二次。本來應該由(b)推到(c)再推到(d)，但新苗卻倒轉過來，先有了(d)而為了把它合理化，故更改(b)及(c)。比起作為合法馬克思主義者，這更為要害。

新苗第三次是最近發生的。今天一些號稱左翼的人，站在無論甚麼情況下都要反對中共的立場，對於他們來說，帝國主義這核心分析便像幽靈般困擾著他們，始終揮之不去。中國近年的崛起終於為他們開出一條自圓其說的縫隙。最近我跟一位以前在書局的朋友談起釣魚台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問題，這位朋友說：「中國現在都變成侵略者了。」雖然我已退出運動，但最近留意到這個事情，就是一些號稱左翼的人，說中國已變成帝國主義，這是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立場。新苗現時跟社會主義工人黨很密切，我不能肯定新苗是否持同一觀點，但若然，我完全不會感到意外。把中國說成是帝國主義，因此，當涉及中美兩國的糾紛，例如釣魚台、南沙群島等問題，你便不用再基於反對帝國主義這個核心，站在中國一邊了，真是一舉兩得，既可繼續名義上「反對」帝國主義，又不用基於反帝而就一些中美糾紛站在跟中國同一立場。

但是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有很嚴格的界定，在蘇聯崩潰後唯一仍然存在的帝國主義是美國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劉：那即是說「中國已成為帝國主義」這說法是近年才出現？)

應該是近年才開始，如同向X為了反對中共而支持台獨。

(劉：他們反對中共是一個理論性的原因？還是情感上的原因？)

主要是出於害怕中共。如我前面強調過，作為左翼，必須從一個理論的高度來看待中共，不可原則地反對中共，就個別議題（如收回香港、新機場事件等），左翼的立場甚至可以跟中共是一致的。

(劉：但他們也會參與內地工運。)

害怕中共的意思是因此而失去分析能力，故站在無論甚麼情況下都要反對中共的立場。對中共的恐懼主宰了很多人的。

剛才說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有很嚴格的定義，帝國主義是以軍事作為後盾進行的經濟侵略，你只是單純互相投資，並不構成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以軍事介入為後盾，所以自蘇聯倒台後，唯一能夠用軍事力量來保障國家全球經濟利益的是美國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無錯，中國近年在擴張軍事，但遠遠未能做到用軍事來保障經濟利益的地步，甚至還未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外圍；若然中國要攻打台灣，他完全沒有這個能力，所以如果中美發生衝突的話，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軍事上應該站在中國那邊，因為歷來都是美國侵略中國。

那麼是否每每都要站在中國這一邊？當然不是，講釣魚台的問題就一定站在中國這邊，因為這是中日侵略的後遺症。就南沙、東沙等，我不清楚有關主權的問題，我沒有詳細考究，但假使就這問題沒有足以定案之證據，我會區別不同情況。就中國與菲律賓的爭議，我會軍事上站在中國那邊，因為菲律賓跟美國是軍事伙伴，矛頭指向中國，所以這是帝國主義的問題。就中國與越南的有關糾紛，我的立場會有所不同。因為中國曾經侵略越南，作為殖民地統治其九百多年，基於這個歷史因素，就算中國在島礁上擁有主權，我認為除非美越軍事上合作，否則中國也不應以一個強硬方法對付越南，始終中方必須為其過往的侵略負上一個歷史上的道德責任。

就西藏問題，我認為西藏並不屬於中國。西藏是清朝侵略所得來。你若跟一般藏民接觸，（藏民）根本在文化上不認同中國文化，因而在西藏問題上我認為中國需要（與西藏）達成一個協議，縱使中國（在西藏）的投資很多，她應讓藏民選擇是否留在中國（若然，它跟中央政府便需要協商出一個妥善的安排），還是選擇最終獨立；當然，我認為這須要一個協商過程，若西藏選擇最終獨立，這涉及應作出甚麼安排補償中國在西藏的投資等。不過，就西藏問題，我要補充一點：我反對1988年北京奧運前借西藏問題而破壞聖火的行動，包括在香港搞這些行動的A君及支聯會那班人，因為京奧涉及中國人之「百年夢」，而這個「夢」跟整個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有直接關係。

我以上的觀點具體細節上不一定準確，但關鍵的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事情要按帝國主義的科學定義來分析。基於「中國已成為帝國主義」這說法的實踐，客觀上就是充當美帝的幫兇。

現在如麗凝所言，原來（新苗）的筆桿子認為不應再「保釣」，正如我剛才所講，由支持台獨開始直至現在，他們把帝國主義從自己的理論刪除。釣魚臺是一個帝國主義問題，若（他們）說不應再支持保釣運動，不是改變了整個理論嗎？純粹是因為他們無論甚麼情況下都要反中。基於對中共的恐懼，實在讓很多人在政治實踐上，不論中國任何方面都是反對。如果跟他們的綱領、理論相違背，他們便改綱領，改理論。這是我對新苗這一派多年來的看法。

另外，（新苗）曾在群眾運動中舉出一個獨立的政治綱領嗎？他們與十評不參與、不鬥爭（的實踐）不同，新苗這一派是有參與的，且又比較活躍，但他們曾經在任何時間拿出過獨立的、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綱領，嘗試去動員群眾嗎？從沒有。在馬克思主義運動，除了機會主義外，還有一種叫「尾巴主義」(tailism)。Tailism的意思是指，永遠追隨群眾，群眾到哪裡

去你便隨之跟到哪裡。我在四五行動常言道，如果群眾方向錯了，你必須站出來去批評群眾的錯誤，因為你需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綱領。比方說「港人救港」，支聯會所能動員的群眾一定比我們多，但我們也能以「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去動員一部分人，這就是我所指的獨立的政治綱領。我們反對新機場選址，這又是一個獨立的政治綱領。

說起新機場事件，最初與我一同在報章發表文章的區議員，當時他站穩在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和立場，可是在九七前夕，他也受不了對中共的恐懼，而站到一切反中的立場上。董建華在回歸前、還未上台的時候，因為樓價一直被炒高，提出徵收資產增值稅，而眾多地產財團因此指責董建華和梁振英。當時我致電該議員，問他：為何不發聲？我們左翼及勞工界多年來爭取徵收資產增值稅都未有成果，現在有少許機會，而大財團炮轟（徵收），為何不發聲？莫因是董建華提出而不發聲（爭取），應該針對綱領，而非針對某一方。他支吾以對……那時他組成了一個四人的組織，我忘了組織名稱，成員包括一名女士及兩位職工盟的領導人。他說先問過卿姐再作打算……

(葉：是不是「前線」？)

可能是「前線」前身……我回應他毋用多說，若他先問卿姐（意見）又怎會同意「發聲」呢？由此可見，該議員曾在新機場事件穩站綱領，卻無法在九七年堅持下去，都是源於「一切反中」。若你問我恐懼中共嗎？九七年之前，我們曾經討論如要轉成「地下（黨）」，該怎麼辦，但無論如何這都不是怕與不怕（中共）的問題。因為馬克思主義運動是指由理論推到綱領再推到實踐，若無法做到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運動。若你不能拿出一個獨立的政治綱領去進行鬥爭，就算有多積極參與，都不是馬克思主義運動。所以新苗或是現今的左翼廿一都只是「尾巴」——群眾的「尾巴」而已。

說回頭，將中國視為所謂「帝國主義」，完全違反帝國主義的定義，這是新苗第三次改變他們自己的理論。

(劉：我找到了《理性的黃昏》。)

我只見過虞雪數次，都限於客氣的寒暄。另外黃望潮也是紅衛兵領袖，還有一位紅衛兵領袖（已成為教授，已屆退休）；黃望潮最慘，他精神崩潰了，他與虞雪是同一段時間下來的。

(葉：他們都是廣州過來？)

黃望潮是從廣州過來的，他在精神病院住了一段長時間，我和他在書局的時候都經常討論，還有跟他見面的人是唐XX，因為黃望潮曾有段時間住在她的家，我不敢講他還是不是住在精神病院裡，這是令人唏噓的。

(葉：虞雪還在香港嗎？)

我不敢說，在書局跟她見過面之後就沒有她消息了，反而後來都有再見過黃望潮（未精神崩潰之前）。

(葉：很多我所知道當年的紅衛兵造反派都去了外邊，例如劉國凱，他寫了好幾本關於文革的書，特別講到廣州的紅衛兵，他後來去了美國，跟王希哲都是屬於紅旗派，裡面還有很多內部才知道的故事。)

還有一個早期的民運人士，就是1957年反右的時候，他叫做林希翎，我們最初在書局很仰慕這個人，她是社會主義者，後來不時來港，每次來港都約我郊遊（由我駕車）和食飯。她在法國仍然是左翼，我最後見她的時候她是托派，是一個非第四國際的托派Workers Party，那個托派我都認識，也見過他們的人，印象最深刻是帶他們吃上海菜，他們讚不絕口。

(葉：我想問一下九十年代，大約1989年後四五行動（成員）的組成變化，上星期你提及四五行動在九二九事件後內部存在著爭論，有約一半的成員離開（最少一半。）……人少了，內部（剩餘）成員的思想背景應當更為接近，相對比以往接近，若是人多，會比較多不同意見。比如我的同事劉健芝，也是當時離開的成員。早期（四五行動）比較多這類成員，不一定是革馬盟或馬克思主義者，這樣而言內部成員思想背景的接近程度是否更高？)

基本上四五行動後期的核心人物包括：革馬盟的人、革馬盟外圍、我及少數個別人。

(葉：所以大家思想的背景很接近。)

新機場事件大家站穩了立場，但自從A君成為支聯會常委後就出現了變化。9 2 9事件後，我非常敬重的革馬盟第一把手退出了運動，「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這句口號是他提出的，如果他沒有退出的話，可能會帶來多一點制衡的作用和力量，雖然他對理論不太感興趣，但他能夠站穩馬克思主義政治綱領的立場，另外A君亦對這位革馬盟第一把手存有顧忌，始終大家在革馬盟長時間是同志，同時我留意到A君是重視他的。

(葉：我留意到後來，似乎是因為香港出現了新的政治形勢而出現了一些分歧。)

由A君加入支聯會常委至我離開運動這段期間，大家的主要的分歧是基於機會主義的抬頭，而我沒有能力去逆轉這個發展。當時仍留在四五行動的革馬盟成員還有不少，但經常開領導會議的只有三人，當中有一位跟我的立場一致，有一位（我覺得是基於私人理由）比較同情A君，最後一位就視乎情況(有三份之二時間支持我的立場，但有三份之一雖非支持但不反

對 A 君的立場)。不過最重要的是當時四五行動沒有紀律可言，就算在四五行動輸了內部辯論，A 君轉頭就跟外面的朋友搞行動，而剛才提到之最後一位革馬盟的朋友，對這現象特別忿怒。

(葉：機會主義都需要有一個前提，就是機會的存在才會有機會主義的抬頭，除了你提及過加入支聯會常委和參選立法會，這些都是九十年代慢慢出現新的政治機會，例如群眾越來越多的泛民或主流派，另外可以跟他們走近的機會亦增加，這些機會是過去不太存在的，是在八、九十年代才慢出現的。)

假設四五行動沒有經歷 9 2 9 事件檢討引致元氣大傷，而革馬盟第一把手沒有離開，我覺得四五行動是有能力以一個獨立的、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綱領去參選。在 A 君加入支聯會常委之前，情況還未出現。

(葉：他是哪一年當常委？)

可能是1995年左右。他是在新機場事件之後才當常委，雖然他在回歸時寫的兩張傳單中，從字面上都跟隨著綱領，但機會主義已發展了一兩年的時間，後來亦逐漸變本加厲。我記得他第一次參選並沒有成功，我退出四五行動後亦見過他，我記得當時他說票數差距很接近，所以他很開心，因為覺得自己真的有機會可以勝出選舉，果然下一次就勝出了，所以這就是更大的機會。在我摸索政治運動的指導思想及如何制定政治綱領的階段，我受過他不少啟發，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成為親密的同志。

總結一下，我退出運動是因為覺得香港馬克思主義運動已完全破產，革馬盟已經消失了，我無法逆轉四五行動內的機會主義，十評素來不是參加運動的力量，而新苗除了是合法馬克思主義外，還按實踐的需要而更改自己的理論和綱領，兼且是尾巴主義，從來沒有一個獨立的綱領去動員群眾。因此我界定香港馬克思主義運動已經死亡。

由大學時期梳化馬克思主義開始，到我2001年退出運動，一共有二十七年。自我成為(b)、(c)和(d)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我覺得四五行動是唯一貫徹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旗幟，是有這方面的貢獻，其他的派別（如新苗、十月）沒有做到；因為革馬盟參加了四五行動，特別是運動高潮時有作出貢獻，他們不是布爾雪維克，尤其自吳仲賢離開後，他們就失去了一個水平比較高的領導人，可惜929的檢討後大傷元氣，革馬盟都消失了，他們當中立場站得最穩的兩個人，一個仍然留在四五行動（於2001年繼我之後亦退出了），另一個則退出了，因此機會主義能夠抬頭，所以2001後已沒有馬克思主義運動，而過去四五行動曾經能夠做得到。

(葉：因為近年坊間流傳一個關於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你提過支聯會曾經嘗試在百日祭的時間想刪除這個口號，這個口號的出現是否跟四五行動有關？)

可能是，但我不敢肯定，因為我記不起支聯會何時首次採用這個口號，但我肯定是我們最先提出。

(葉：有種說法是四五行動參與支聯會工作的時候，要求需要加入這個口號。)

我不敢講是不是我們要求，當時我們派了一位十評的成員去支聯會開會，她是一位很能幹的女士，我記得有一次支聯會有人說我們倡議買軍火，她澄清她從來沒有這樣倡議過，我們就相信她。

我講下我後來為何放棄馬克思主義。我離運動時我仍然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不過我離開運動後開始思考多一點之前擱置已久的問題。馬克思認為真正的自由須要建立在物質豐裕的基礎上。何謂真正的自由？就是人的自我提升，如果你看德意志意識形態講一個共產主義生活會是怎樣，就是人的自我提升，例如讀書。社會主義運動其實有一個重要假設，就是有條件和機會的話，群眾會追求自我提升。我舉一個勞動節的口號做例子，就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學習」，很多人喊這個口號但不知道背後的理念是甚麼，就是追求自我提升。我認同人的自由是能夠做到自我提升，但是否一定要建立在豐裕的物質基礎上呢？我其實是九十年代中開始有這個問號。

到底何謂豐裕的物質？其實如果你想自我提升，即使沒有豐裕的物質基礎都做得得到。現在我可說是半個莊子的信徒，莊子很窮，雖然他曾當官但他厭棄政治，楚威王曾經邀請他做丞相他都拒絕，雖然很窮但仍然可以自我提升。當然如果連生存都顧不了，便無法講自我提升。你要生存和基本的生活，人類歷史上很早就可以做得得到，不需要豐裕，所以「自我提升」是價值選擇(value choice)，我們以前是假設，只要有條件和機會，人人都會作這個選擇，我退出運動後我對這個問題再思考，我不否定這個可能性，但找不到理論根據支持人一定會這樣做，經過幾十年的教學（從中學到大學）及十多年動員群眾的經驗，實證上我見到很多人（就算擁有很充足的生活）也不作出這個樣選擇，我不會純粹被實證所說服而放棄馬克思主義，但是我找不到一個理論根據，為何人(群眾)如果有條件和機會的話，大部份人會作這個價值選擇。

第二，追求物質生活富裕是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共通點。我於九十年代中以前，是以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的態度去對待環保主義，就是相信可以用人的理性去解決環境污染。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前往印尼的一個小島旅行，那次是一個很大的啟發，這個小島仍然倖免於人類文明的破壞，見到大自然後就啟發我去思考，到底人類文明令我們損失了多少東西呢？這損失以後是無法補回的。九十年代中以後我對自然的嚮往，未讀莊子已體悟到天人一體之境界，後來讀莊子，他於二千多年前人還遠遠沒有破壞大自然的能力時，便提出天人一體，真是大智慧。於是這涉及另一個價值選擇：物質提升還是減低給自然環境帶來人類理性不能找方法

補回的破壞？所以，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是以一個價值選擇（物質提升）作為另一個價值選擇（大部份人會追求自我提升）之條件，既然我認為沒有理論性的原因可說服我後一個價值選擇的可能性，去追求前一個價值選擇便更加成為疑問了。所以，我就開始質疑傳統馬克思主義追求提高生產力，來作為人的解放的條件這個核心觀念了。

過去二十年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很多人嘗試在馬恩全集裡尋找馬克思有沒有提及反對破壞大自然的片言隻語，企圖證明馬克思主義與環保沒有衝突，我之前看過不少這類論點，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亦都鼓吹這個論點，我從來未被他們說服過。以我認識的馬克思主義，追求生產力的提高，這是他一個基本觀點。這是我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之第一個大疑問。以往我覺得馬克思主義可以在理論上推導出它的核心結論，現在我覺得不是這樣，因為裡面涉及到價值選擇這個重要問題，沒有理論可以決定到底應該選擇甚麼。

我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原因都與價值選擇有關，因為我發現很多時候都是價值選擇的問題。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探討一個真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綱領界說二篇》其中一篇。我當時有兩個問題，首先技術上是否可行？在現在數碼化的科技下計劃經濟可能是可行的，無論如何，技術上的可行性仍然屬於技術上的問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我當時的另一個問號是，計劃經濟必然是很有紀律的社會，無論是生產、分配和消費都是個很有紀律的社會，這種社會是否我們想追求的價值？由於我參與運動所以擱置了這個問題。直到我思考剛才那些問題後，這個問題就重新提出來了。一個如此紀律性的社會，須要抑制自發性。沒有剝削、真正按勞分配是好事，但要做到這個地步便需要計劃經濟的紀律，這種社會是不是你想要的社會？雖然我不想要剝削，我仍然同意利潤來自剝削，我想要按勞分配，但這種紀律化的社會未必是我想要的。正如剛才所說，我後來發覺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出現問題，因為它撇開了價值選擇的問題。所以我今天不會再形容自己是馬克思主義。

如果你問我按我的認識，今天的左翼（不論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政治綱領應該是甚麼，我仍然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問題；例如蘇格蘭公投決定是否脫離英國，我認為應該投脫離，主要是因為獨立有可能使蘇格蘭脫離北約，而北約在蘇格蘭有核潛艇基地，就是為了削弱現在唯一的帝國主義。所以美國打伊拉克，我政治上不是支持侯賽因，但我希望軍事上美國打敗仗，就是因為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你只要回想一下美國在越戰戰敗後，直到1990年打伊拉克前十五年都不敢輕易四處出兵侵略，便可以知道打敗美帝是何等重要。

我也是這樣看香港問題，可惜香港已失去了符合馬克思主義之獨立的政治綱領。例如新苗實際上放棄了反對帝國主義（雖然口說反帝，但具體政治問題上卻刪走了帝國主義這因素，就已經脫離了左翼的立場）。我認為關於香港的問題應該從綱領性的立場開始。我前兩年（就是反國教事件那段時間）遇過一名左翼廿一的成員，亦遇過一個民主黨的成員（以前屬於社會民主那一翼的），當我以前說倒彭反殖爭民主時，他是支持我的，我問這兩個人：「你們真的反對國民教育嗎？」我絕對反對政府那個指引，但無論你是否稱為國民教育，但必須支持認識中國，你反對官方的指引沒有問題，但是一刀切反對國民教育，我說這不是一個左翼的立場。兩個人其實都不反對認識中國，於是我問為甚麼他們不發聲呢？那位左翼廿一的朋友類似答了很難表態，因為怕被人喝落台；那位民主黨的領導人說會用另一個方法出聲，就

是那一年的六四晚會製訂了一個新口號，就是「愛國愛民」，這有可能是徐漢江所提出來的，你也知道他因為這件事辭職(支聯會)。

(葉：不只是口號，而且後來他跟丁子霖發生了衝突。)

但都跟這件事有關。因為別人說不要愛國，支聯會便立即收回「愛國愛民」這口號。總之支聯會內有個別人是想堅持正確的立場，其實所謂「愛國」，八九年時我們舉國旗不代表我們認同共產黨，所謂「愛國」不是資產階級，或是親中的愛國，而是從一個香港問題屬於帝國主義遺留下來的角度去，你一定要採取這個立場，但支聯會李XX一見反對便立即收回，這就是我說的「尾巴主義」，如果跟你的政治綱領吻合的話，即使群眾不喜歡聽，你都要講出來，否則你如何當政治上的領導呢？政治上，你不是做領導，就是做尾巴。

若果「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時期的四五仍然存在，我們必定跟「反國教」運動打對台。見到一些前四五及七十年代反殖的朋友投入或支持反國教，你能不感到悲哀嗎？一些是走機會主義路線，一些是水平低，一些因對中共恐懼而喪失理智。這引申到我前面提及之一個問題：很多人投身運動是感性先行。對於他們來說，造反天然有理。我著重理論、綱領、實踐的統一，所以會問「造甚麼反？」假使這個「甚麼」違背按理論而製訂的綱領，就必須批評和反對這個造反的實踐。我試過忍不住口而跟舊日的戰友就此作出討論，弄得大家不開心，此所以我近年一般都不願意談政治。

在學術上我維持一個左翼立場，今天，左翼學術最重要的基礎是反對歐洲文化中心主義，所以我近年自己的研究興趣是中國古代思想，為何研究這方面呢？我是想比較古希臘的思想，大部份時下的理解都是在歐洲文化中心主義最當道的時期所得出的結論，我目前是想從一個反對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角度來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教學上，我針對香港近年的情況加入一些極之「政治不正確」的課題，就是講「他者化(othering)」、「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例如一個內地媽媽讓兒子在路邊小便的個案，被stereotype為內地人的普遍特徵)，我教學生種族主義、歐洲文化中心主義、殖民地統治所產生的心理作用（法農Frantz Fanon的分析），我提供一些文本及資料給學生，都是關於香港後殖民時代出現的這種情況。目前我的學生全都是九十後，很多學生都傾向支持「光復運動」，我仍然嘗試與他們討論這些題目，我對他們說，我是從學術角度，介紹一些學術概念、觀點給他們用來分析近年香港發生的事情。

有一點我必須強調，雖然學術上我維持左翼立場，做學術的人必須認識到，立場可以影響我們所選擇的研究及教學課題，但論證上則必須遵守客觀性，不然便淪為政治宣傳。可惜的是，不少學者（香港和海外都有），就是忘記了這一點。

(葉：你離開四五行動時有一個判斷，就是香港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破產，如果從你個人來說，我會明白因為你在四五行動裡見到機會主義的抬頭，甚至可以說代表機會主義抬頭的人

物甚至成為了立法會議員，你的判斷是個人政治經驗實踐有關，除了特定團體的個人經驗外，有沒有你對整個香港的運動或政治形勢的判斷有關，從而得出這個頗斬釘截鐵的結論？)

當時跟現在的情況絕對不同，很可惜那位革馬盟第一把手因為那個檢討而離開運動，變成沒有多一份抗衡的力量，終於令我2001年退出運動。之後便失去了馬克思主義的獨立旗幟，即是在運動和社會政治層面已失去了一個獨立的、符合馬克思主義和左翼的政治綱領，但最初的情況只是主流民主派佔主導，真正的轉變是2006年本土行動的誕生。

如果當時公共空間仍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綱領，它會批判本土行動，本土行動是一個年青一代，或後現代版本的本土利益主義。我個人都不想拆天星碼頭，現在的學生不喜歡基礎理論，所以你要辦一些他們喜歡的科目，我其中一科是旅遊社會學，也講保育，終於就搞了這個課程出來。我都希望保留這個鐘樓，但問題是你採取甚麼綱領來要求保留，我沒有詳細研究有關本土行動的細節，但它給我的印象是強調本土身份，因而客觀上構成了新一代的本位利益主義。所以從一個左翼的立場，應該要批評本土行動。

接著就發生自由行的問題。目前我對著90後的學生講解「他者化」，當然我用了其他例子，但最好的例子就是與內地人發生衝突，我告訴他們，大戰前德國，納粹主義就是將社會當時面對的問題，首先將猶太人他者化，然後將所有問題推卸在猶太人身上，這就是「代罪羔羊化」；目前香港人也是將內地人他者化，然後將香港面對的問題全部歸咎在內地人身上。我對照這些個案，告訴學生以史為鑑。這個政府不承認這些問題，尤其是曾蔭權年代，如果大家客觀地看，曾蔭權是最大的問題，而他又不承認這些問題，所以批評政府完全正確，但是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另外一個例子是內地的資金推高了香港的房價，這是事實，但問題是政府的政策出錯，而曾蔭權政府又不承認出了問題，亦不願提出政策對待；97年之前大量港人移民加拿大，當年加拿大人批評港人推高了當地房價，那些把內地人他者化的港人還記得嗎？當時香港人的做法是理性的行為，如果你有資金有機會的話也可能會這樣做；同理，內地資金來港也是理性的行為，你不能將他們變為低一等的人，將內地人他者化。我不是支持政府，也不是支持大陸，我只是提醒學生應該以歷史為鑑。59:58我經常強調這件事，免得學生以為我親中，現時香港標籤化很厲害，極之非理性。

我覺香港近年的發展與左翼的政治綱領是違背的，最大問題是自從2001年失去了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或左翼的政治綱領。

(葉：2001年離開四五行動的時候，沒想過要另起爐灶？)

沒有，其實，如前所述，我在九十年代中已經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一些疑問，不過把它們擱置了，2001年離開運動後才開始從新思考這些問題，始終我都是一個比較著重理論的人，因為我覺得這些疑問涉及重大的理論問題，於是我覺得馬克思主義是有問題的，所以我的懷疑變得越來越深。作為一個學術觀，我以前絕對相信唯物史觀，後來有一個名為分析馬克思主

義 (Analytical Marxism) 的流派，我讀他們的著作也未能說服我唯物史觀有問題，但是近五、六年當我研究中國古代及古希臘的思想發展後，我越來越覺得歷史發展中偶然因素的重要性，我不是第一人提出這個觀點，但是比較理論性地進行研究，很多歷史學家都說歷史很多偶然和意外，但沒有將它理論化。近年開始有些研究中國及西歐經濟（由十四世紀開始至十九世紀）的對比。

(葉：是Great Divergence那些嗎？)

沒錯，他也是contingency approach，我已得出自己的結論後才看這本書。我越來越被這個approach說服，目前，我有一個比較大的寫作計劃，講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思想的比較發展，用contingency approach批評現有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分析。所以，學術上唯物史觀仍然有它的價值，但是當我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打問號之後，這個問號變得越來越大，所以我不會再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了。

嶺南是否本土派思想的發源地？

(葉：我不是這樣理解，雖然我是本土行動的成員，但我們當年的本土行動所想像的「本土」與你剛才提及要光復行動不只是不同，甚至現在是衝突，我們有一個成員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去解釋他們之間的分別，首先本土行動不是講「本土利益」，例如我設計過一個行動，就是預備一艘船由尖沙咀天星碼頭駛至皇后碼頭，然後邀請了一些所謂代表本土的人，我們找了菲律賓及印尼的傭工、居港權的家長、印巴籍人士等，我們想講「本土」的意思不是指本土利益，甚至不是香港人的主體，反而是基於偶然底下相偶碰撞，如果說我們「後現代」是可以討論一下何謂後現代，但我們嘗試重新去定義「本土」一詞，目前我們反而是被本土派罵的。)

我曾聽過左翼廿一不知道為了甚麼，被人在政府總部喝倒采。

(劉：應該是香港電視集會開始的。)

我只知左翼廿一被罵，但不知道你們也被罵。

(葉：我們現在被人剝除「本土」的稱呼，其實我們以前從來沒說過本土利益的問題，甚至沒有講過任何本土優先的說法，但我同意你的講法，就是論述上失去了馬克思主義或比較清晰的左翼綱領，因而容易被別人挪用了某些概念。)

因為我不太留意你們，只是留意到本土行動中「本土」一詞，我對它是相當敏感的。第二，嶺南給人一個感覺，不是從一個以反帝為核心立場的左翼觀點作為立足點。有很多人都自稱

左翼，但空泛地自稱左翼，與按 (b) 製訂(c) 再去到 (d) 的左翼可以是兩回事，因此，我有一個印象是由過去的本土行動到今天的本土民主前線，似乎是一脈相承，因為你們欠缺清晰的綱領。容許我再提一個友善的評語，嶺南不只講「本土」，還講「我城」。我還沒有機會拜讀你們有關「我城」的這本文集，但表面上，「本土」加「我城」所給我剛述的感覺，我一些前同志都有。

我去年教書用過一個關於「政府山」的問題做案例，你可以到「政府山關注組」的網頁看看，你們嶺南裡有一位「有名」的同事帶了政治建築觀賞團，裡面大話連篇，他說當年政府山的設計表明當時的政府.....

(葉：哦，那是陳雲帶的導賞團。)

當時一位同事邀請了一名政府山關注組的發言人當研討會的講者，我聽到火起，她說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如何親民，因為我是研討會的主持，不能發聲，會場中一位朋友很想反擊，不過因為我是主持才不去批評她。我對你們嶺南這位陳君實不敢恭維，我發覺他真的可以睜著眼說大話，你看他的導賞團所說的內容，不用說是左翼，任何居住在殖民地，經歷過殖民地統治的人，都知道他大話連篇，為甚麼要講大話來美化殖民地統治？還算得上是知識分子／學者嗎？我讓學生用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概念做這個個案研究，講social constructionism，叫學生用福柯 (Foucault) 的discourse theory講解這個案。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來說，社會上竟然沒有一個左翼的聲音去批評這件事，你說香港的左翼是不是完旦了？

(葉：你剛才提及香港目前缺乏馬克思主義，或清晰的左翼政治綱領，與今天的右翼，甚至是極右的現象出現是相關的。)

我很高興你同意這個看法。

(葉：我完全同意，我們朋友之間有討論這些問題，其實這個專輯的其中一個目的，除了學術和知識性的目的外，也想尋找香港的左翼重要的傳統，我覺得很多問題其實以前是討論過，不過討論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另外對泛民的批評，你們可能是最早批評泛民的人，如果比較過去及現今到泛民批評是相當有趣，例如你們當年批評他們「本位利益主義」，現在所謂右翼的本土派就會批評他們「大中華」。)

你可以想像香港的座標轉變得多麼厲害，所以當我決定接受訪問時，我必須講何謂左翼運動和它的歷史，我個人只是這運動的一份子，一首插曲，最重要是將曾經發生過的左翼運動的情況，以及左翼運動消失的過程，我是從這個角度來預備這次訪問的。那個內地的公共知識份子找我訪問，我都是採取相同的角度，但奈何時間太短；這位內地知識份子問我，為何我

不把這段歷史寫出來？因為這不是我目前最優先要做的事情，可能退休後我會先找報章資料，然後才寫出來，我相信紀錄這段歷史是值得的。

總結一下，2001以後，反國教（而非純粹針對政府的指引）、蝗蟲論、驅蝗行動、大話連篇地美化殖民地統治、舉殖民地旗、「光復」行動、城邦論等等，那些原本出身自左翼及今天仍以左翼自居的、現在還參與政治的組織和朋友，我似乎沒有聽過他們對這些作出過任何反擊。從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角度看，就那些有足夠政治運動經驗的人而言，這只能有兩個解釋，不是機會主義，便是尾巴主義。從「中港本是一家，救國才能救港」及新機場事件的四五到以上近年來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大反動。機會主義和尾巴主義讓這個反動長驅直入，勢如破竹；有關這段機會主義和尾巴主義的歷史，除了我，沒有人能夠告訴你們。

最後，我想補充兩點。首先，我在上述談到不少人物與組織，直到2001年，我就他們所說的話，是作為一個參與者的批評，以自己跟他們對立的政治實踐為基礎而作出的批評。自2001年以後，我的身份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過去的參考者，因此而是對這個運動有一定認識，而仍然持有左翼觀點的旁觀者。我以上關於2001年以後發展所說的話，是從這個身份而作出的，因此並不構成批評（既然自己已退出運動，便沒有批評的資格），而應視之為這樣的一個旁觀者之評論。我現在不問政治，本來是不願意作出這種評論的，近年來，除了做學問，我只求致虛守靜（老子語）。但你們是一個嚴肅的口述歷史計劃，我既然說我2001年退出運動是因為香港馬克思主義運動已經死亡，故有需要提出論據，而這便不能避免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就我退出後的情況作出評論。

第二，我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亦不再相信革命。但按我對左翼運動之理論與綱領的認識，上述我所認為今天一個左翼運動的綱領所應有的內容，不須跟是否以推行革命為目標掛鉤，換句話，按我的認識，即使不以推行革命為目標，一個左翼的綱領亦應包括這些內容。

關於劉榮錦先生訪問稿的幾點澄清（區龍宇）

今年初嶺南文化研究系的葉蔭聰先生和劉麗凝小姐，訪問了前四五行動成員劉榮錦，其中涉及新苗/先驅的評論，多有事實錯誤，在此澄清。

1 「新苗的精神領袖向X寫了一篇支持台獨的文章」：無論是新苗還是向X（疑為向青），都不支持台獨，而是支持台灣有權獨立。這兩者是不同的。先驅網站（<http://www.workerdemo.org.hk/>）有全部30年的新苗/先驅雜誌電子檔，要查找有關文章一點不難。有權獨立而不選擇獨立，最近便有蘇格蘭公投的例子。澄清這點有現實意義，因為今天香港也處於關鍵時刻。我們應該迫使中共承認港人有權獨立，但不宜實際挑選這個選項。

2 「變種/變形工人國家」：托派正確使用的名詞，在蘇聯，是稱之為「墮落工人國家」，在東歐/中國，則稱為「畸形工人國家」。「變種/變形」是中性詞，而「墮落/畸形」，是貶義詞，兩者相差很大。

3 劉先生把新苗稱為「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意謂「所有行動都必須合法」。此詞來自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按照劉先生的解釋，他們認為，「俄羅斯下一步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現在還未到工人階級的革命，所以做甚麼都一定要合法。」

上述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解，幾乎每句都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與主張「所有行動一定要合法」無關。不能望文生義。那是十九世紀最後十年的俄國產物。主要代表是司徒盧威等人。當時司徒盧威和普列漢諾夫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都一起批評非常流行的民粹主義，指出後者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就實行社會主義為空想，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無可避免。由於是批評沙俄的大敵民粹主義，所以最初沙俄秘密警察覺得是好事，就容許他們在合法刊物上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便是「合法馬克思主義」的來由。多得沙俄警察，於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廣泛傳播。不止司徒盧威的著作，就是其他人的著作，也得以發表。特別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俄文版。事實上，在合法書刊上發表著作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少也從事地下刊物的出版和發行，所以「合法馬克思主義」並非指合法主義。還有一點重要線索，就是司徒盧威本人，正正是那個非法的地下黨即俄國社會民主黨1898年第一屆代表大會宣言的執筆人！但這批馬克思主義者，很快出現裂痕。列寧是後起之輩，他覺得，司徒盧威的馬克思主義，很有問題，因為他只講資本主義怎麼不可避免，怎麼比封建主義進步，卻不談資本主義的內部階級矛盾（資產階級剝削工農）及其社會代價。所以，當列寧用「合法馬克思主義」，來形容司徒盧威，已經不光指當年在合法刊物上的馬克思主義文章，而是特指其中的司徒盧威那一派人，其關於資本主義行將全面在俄國發展的理論，過分「客觀主義」，而忽略其內部矛盾。很快，司徒盧威也全面拋棄社會主義立場，去靠近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所以，這個詞根本不是指主張行動一定要合法那麼狹窄，而是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俄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時所有社會民主黨人，其實

都一致的，沒有分歧。分歧是誰才是這場革命的動力。列寧認為動力來自工農，而司徒盧威則認為來自資產階級。

至於用「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來評論新苗，固然錯用名詞，而且與事實不符。新苗從未主張過「所有行動一定要合法」，相反，新苗是主張公民抗命權甚至革命權的。至於具體場合，應該申請遊行牌照還是不申請，這是策略問題，不是綱領。事實上，在1997年回歸日和2005年抗議世貿，我們都參與了公民抗命行動。劉先生提到《告別衝擊文化》一文，他對此文的理解也是不正確的。此文很易找到（<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0/4612T.htm>）。經過雨傘運動，我更覺得此文值得參考呢。

4 「現在（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跟香港的新苗不只熟絡這麼簡單，以我所觀察他們與這一派是緊密合作」：此非事實，而是臆測。除非把偶然約稿也算是「緊密合作」吧。

劉先生所言不符事實者，不限以上，不過不值得一一釐清了。

5 「我就開始質疑傳統馬克思主義追求提高生產力，來作為人的解放的條件這個核心觀念了」。

很遺憾，絕對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綱領，理解為「追求提高生產力」。馬克思主義的確認為人的解放，需要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但它也認為，資本主義所提供的生產力，已經足夠讓人得到解放了，不需要再由社會主義者去追求更高生產力的，至少不是主要任務了（視乎發生革命的是怎樣一種經濟水平的國家）。「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那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發明，是落後國家共產黨妄想在貧窮基礎上建成共產主義的空想。那與馬克思無關。

如果劉先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稍為嚴謹些，也許不致於對馬克思主義那麼失望吧？或至少不致對運動也整體失望而退出？

2015年7月17日

人民的社會主義：初探《理性的黃昏》（葉蔭聰）

在香港談起「左派」及「馬克思主義」，不少人仍然會馬上想起中國共產黨，或者是親中共的政團、社團及人物。然而，中國的非官方或非正統馬克思主義思潮在香港的發展，往往遭人忽視。本地思想界、社運及政界中人，可能只會依稀記得，中國托派在1949年前後，特別是1952年中共「肅托」後，逃亡離開中國大陸，流落香港，這些中國托派及其香港的追隨者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版的《十月評論》，它之所以勉強能該人憶起，全因它算是當時激進青年的讀物之一。此外，便是不少人提起「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革馬盟）以及它與青年激進運動的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劉山青的著作及吳仲賢的文集裡找到（劉山青，1992；吳仲賢，1997）。

但是，在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文革中後期，好幾位逃亡到香港的紅衛兵，曾經出版過一些文章及文學創作，與香港當時的進步青年有一些互動，這段歷史幾乎煙沒無聞。本文透過介紹虞雪的〈理性的黃昏〉一文，初探一下在1970年代，逃港紅衛兵的反思及其思想價值，以及與香港的關係。

逃港紅衛兵

據一些七十年代活躍年青人所說，〈理性的黃昏〉曾經有相當的影響力。此文既批判中共特別是毛澤東的馬克主義官方理論，同時，又發展出一種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或左翼觀點，與當時香港的激進青年的左翼思潮有共鳴、對話及交鋒。因此，此文對理解當時的思潮輪廓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作者虞雪的真實身份與生平只有零碎記載。她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廣州七中的學生，與如今比較著名的前廣州造反派紅衛兵劉國凱、王希哲等是同代人，皆是文革初年的紅衛兵。1966年，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發起文化大革命，並鼓動年青人造反，全國出現了紅衛兵運動，不單延續過去的政治運動議程，批鬥階級敵人，還在「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中，衝擊黨政機關，發展成派系複雜的鬥爭以至奪權運動，由1966年至1968年間達成頂峰。黨中央在1968-69年之後，要重建秩序，成立革委會，解散全國紅衛兵組織，發動上山下鄉運動，把活躍在城市中的紅衛兵動員到廣大的農村及山區。部份曾持續衝擊黨政機關與奪權，甚至提出激進口號以至自我組織，脫離黨中央指揮的紅衛兵，受到不同程度的鎮壓。這些人當中少數遭處決，大部份被反覆囚禁，例如著名的湖南「省無聯」楊曦光（楊小凱）（汪岷，2012；《開放》雜誌本刊記者，2011）。

在紅衛兵運動過後，部份身處廣東地區的紅衛兵，由於地理上接近香港，相對容易偷渡出境，而虞雪就是在1973年逃到香港的。差不多時候逃港的有林志毅、余源宇、蔡志誠、蔡可

風、吳甦等等。其中吳甦曾在1974年編了《敢有歌吟動地哀——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青年詩文選》，收錄了多位文革時期年青人的詩及小說創作，當中便有虞雪的作品。這些前紅衛兵後來在1977年創辦過《北斗》月刊，可惜到了1978年初便停刊。這裡值得補充一句，他們並不代表整體中國紅衛兵，因為，正如現在研究文革的學者一致公認，「紅衛兵」並不是一個社會性質及政治觀點統一的群體，相反，他們內裡的衝突與矛盾十分激烈（比黨內派系分裂得更嚴重）。籠統來說，虞雪等人只算是大致代表了造反派紅衛兵，甚至是當中被稱為「極左派」的活躍份子，特別是廣東地區的。

根據現有看到的文章及文獻，虞雪是他們當中對理論及思想興趣較大的一位，而吳甦在1974年一個訪談中亦承認，虞雪及她的文章代表了他們這群逃港紅衛兵的思想及立場（學院編委，1975：頁10）。從她的行文以及別人的零星記述回憶，他們逃到香港後，便馬上開始接觸當時的香港知識青年，而這些知識青年當時受到毛澤東思想、托洛茨基主義、其他非正統馬克思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影響。也許因為這個緣故，虞雪寫成的〈理性的黃昏〉是在香港大學的《學苑》率先發表的（當時的《學苑》編輯便有著名的社會派人物黎則奮），後來到了1978年，再由無政府主義者莫昭如創辦的「1984書店」重新編在《革命的成長》一書中，其英文版“The Dusk of Rationality”翌年亦在《中國：革命已死，革命萬歲》（China: The Revolution is Dead - Long Live the Revolution, edited by Kan Sa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為一個加拿大無政府主義的團體。莫昭如在《革命的成長》一書中，把虞雪界定為「無政府／自由共產思想」者（Anarchist/ Libertarian Communist），以及「反官僚的中國知識青年」。

人文社會主義

從虞雪的文章開首兩節，便可以看到她這篇文章的企圖，並不單純是指控中共的專制，批判官方理論，也不單是要重申文革時期造反派紅衛兵的非正統理論。她的理論意圖比這更為廣闊，她要把同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親身的實踐以及經歷，放在世界革命大潮流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中去考察。

首先，她在文首便把造反派紅衛兵的一個著名例子——湖南「省無聯」，與法國1968年學生革命類比起來，視它們為新生的社會主義潮流，而中共、蘇聯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則是合流，打壓社會主義的統治集團。她回到年青馬克思的人文主義，強調生命的力量，這大概受到當時香港開始流行的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弗洛姆（Eric Fromm），她在文章中的確有引述到。她重新突出人的解放，以及批判超越舊有左右派的新支配關係的需要。

首先，她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思辯邏輯的必然性主導，正是「專制圖式社會的哲學根據」，因而衍生出來的理論與實踐，是否定生命本能與個人價值。例如，根據階級鬥爭學說，描繪及解釋無產階級與作為統治者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套學說並不單只是反映與解釋現實，同時成為一套統治集團的理論，改造現實，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像過去任何統治集團，凌

駕全社會進行統治。她回到「社會主義革命為人的解放」的命題，重新考察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理想與實踐之間的鴻溝。例如，虞雪指出，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及恩格斯雖然倡導革命，但亦只提出國家資本及國家統治的措施，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例如國有化及累進稅。而到了巴黎公社起義後，馬克思才提出三項原則：

- 鏟除國家官僚，實行人民選舉。
- 撤銷常備軍，人民武裝
- 實現人民管理

然而，巴黎公社被鎮壓，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則也無從實現。然而，經過列寧以至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改造後，馬克思的人文本主義，以及巴黎公社式激進想像已蕩然無存，變成以「無產階級專政」之名的黨專政，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分歧更大。虞雪重視巴黎公社的想象，並把它與官僚化的黨政專制對立，大概源自毛澤東思想及文革理論，特別是196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所謂〈文革十六條〉）中，反對黨政領導包辦革命，實現巴黎公社的構想，這份文件亦成為全國性紅衛兵運動的開端之一。虞雪的理論起點及前提，明顯有著文革時期毛澤東及紅衛兵運動的色彩。換言之，虞雪等人是把毛澤東思想的理想及革命元素推至極端，最後成為反對現實政治中的毛澤東的力量。

國家極權資本主義：批判托派觀點

虞雪這群前紅衛兵在香港出現，多少確證了流落海外的中國托派對中國的分析。例如，中國托派在香港及澳門的代表人物雙山（王凡西），在1966年文革剛發生不久，便期望參與造反的年青人把毛澤東的假造反變成真造反，把矛盾不只對準中共黨政官僚，還該對準毛澤東的教士化及毛澤東思想的國教化（雙山，1966）。虞雪等人的實踐及理論可以說是實現了雙山的期望，但她們的理論卻與托派不同，甚至是針鋒相對。

她在文章的第三節，進入有關蘇聯及中國的國家政治及社會性質的論辯。虞雪要論證，蘇聯與中國這些號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其國家及社會性質還是資本主義，只是它們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可以稱為「國家極權資本主義」。因為，它們用黨國力量及體制剝奪了個別資本家的財產權，卻固定化了各種資本主義的勞動關係，包括分工、工資制、利潤率等等。她特別提到，不單是蘇聯與中共，還包括托洛茨基，皆混淆了經濟國有化與社會主義經濟，以及統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分別，誤把前者視為社會主義性質。

觀乎毛澤東死後的中共，以及中國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發展，虞雪在1970年代寫的文章具有相當的預視能力，而且，她相當徹底地指出早自毛澤東年代，中共統治已是國家極權資本主義。1970年代，在香港的左翼青年中，既有從中國大陸流落到香港的中國托派，也有受到歐洲第四國際及其他馬克思主義思潮影響。而托派的觀點大致認為，蘇聯在斯大林的統治下雖然是「墮落」了，革命被官僚階級出賣了，但其性質還是「工人國家」，而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在托派眼中則是「變態工人國家」。同時，不管是俄國革命還是中國革命，仍是具有社

會主義性質，即屬「工人國家」。然而，虞雪並不同意托派觀點，她由始至終視蘇聯（不管是列寧、托洛茨基還是斯大林）及中共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變型，蘇共與中共只是統治集團。她總結性地指出：

「實現土地國有和城市生產資料國有，只是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關於這點，革命前夕的列寧也承認過。真至如今，蘇聯一類國家的生產方式並沒有超越這個界限。並且，國家極權資本已經被固定為國家經濟結構。無疑，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界限。（更不用說中國1949年的革命了。）」（虞雪，1978：頁32）

虞雪在1974年很明顯的對話對象，就是托派。她要否定的，是始自列寧以來的先鋒黨理論——視一少撮革命者集團領導、教育及代表革命群眾及革命意識。因此，她對托派毫不客氣，她甚至批判著名的「不斷革命論」，認為它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卻誤解了俄國及蘇聯的經濟性質及政治統治性質，因此，成為替「統治黨欺騙了無產階級」。

「「被背叛的革命」（筆者註：托洛茨基的著作）有一個牽強的邏輯——因為工人革命的果實；生產資料國有化，仍舊為蘇聯國家所保持。因此，蘇聯仍舊是一個工人國家。我們懂得，封建貴族利用奴隸起義建立的封建經濟，即便從廣義來說，可稱為如奴隸起義的果實。但是，我們決不會因此認為封建地主國家就是奴隸的國家。同理，生產資料國有化是一個政黨利用人民革命的力量實現。但是，這個果實代表新興統治集團的利益，它是統治黨出賣工人利益而取得的果實。人們很難接受托派的不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人國家的概念，這是自然的。」（頁33）

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

虞雪否定托派對十月革命、蘇共及中共的細緻看法，進而批判托派用「官僚階層」一詞來掩飾統治集團（蘇共）的作用及其反動性質。因此，她以及她的同志，乘著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既反抗現實中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共，也走出了列寧第三國際的理論框架，發展出一種左翼民粹色彩濃厚、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且，虞雪運用了香港這個相對自由的空間，不需要像楊曦光在1968年〈中國向何處去？〉中那樣「打著紅旗反紅旗」，仍然高舉「毛澤東主義」反中共，而可以把她們的理論分析及立場更清晰地展現出來。

對這些剛從文革中逃出來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戳破毛澤東的「宗教」，因此，他們代表了一種啟蒙及覺醒運動。而虞雪把這種宗教的威力並不單純視作統治集團的強制或灌輸，而指向「群眾個人無能導致的依賴感」「給我們理想吧！給我們目標吧！給我們現實的道路吧！——人們太懦弱了，他們渴望依賴和崇拜，需要一個削造過的“理想”支撐脆弱的心，或是需要握住權力來平衡自己的無能感。他們們寧願犧牲，而不相信自己能夠承擔自身。這樣，人長久地成為奴隸。人類的偉大自覺時機要到來的，我們不能縱容自己的無能，我們不能縱容人的無能。我們在不停頓的戰鬥中，不是深求權力統治，而是趨近一個唯一的理想，這就是——人類的平等與生命的自覺！」（頁36）

最後一點值得一書的是，虞雪對解放後中國的分析與批判，亦影響著香港。正如吳甦指出，他們這些逃港紅衛兵十分在意自己與當時在香港的「反共」陣營劃清界線，不管是與國民黨有關還是美國有關的，他們的出現標誌著香港漸漸脫離冷戰二元對立。在論述上他們也把自己視為「人民社會主義」的一員，與香港當時及日後的托派既有類同，亦有分別。虞雪把中國革命在1949年後，分成毛澤東的主觀「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以及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前者是建國以來歷次的政治運動，推動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宗教」，它以文革為最巔峰，並在大亂之中最終破產：即所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人，無論是保皇還是造反，都遭到鎮壓，因而對這套宗教的幻想徹底破滅。至於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則以1957年雙百方針及整風運動，一直延至文革的造反派紅衛兵運動，進行反官僚的鬥爭。

這套歷史敘事框架，塑造了香港左翼批判及反對中共的傳統，與香港托派的論述互相和應，其作用在日後廣義的左翼青年的論述亦能看得到。例如，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香港大學生及年青人支援「北京之春」及民刊運動，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於1982年編了《民主中華：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書中收錄的文章始自大鳴大放及反右時期的異見者文章（如譚天榮及林希翎等），一直到文革時期，以及「北京之春」期間，並把他們歸為「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這套「民主中國」的敘述及論述，經過1989年六四事件，成為香港民主派的組成部份。

虞雪的論述最缺乏的是革命策略或戰略，她的革命觀否定任何中央化政治組織，一切她貶之為的權力集團。她的論述有一種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味道，把群眾路線推至最徹底。然而，她把革命群眾或力量抽象為「生命」或「生命力」，一種追求平等與自覺的力量，這種高度抽象及哲學化的論述，缺乏在地的革命策略及戰略分析，也許正是令他們這個曇花一現的小群體無法在香港生根發芽的原因之一，也令他們無法產生更具體的政治影響力。不過，他們的思想價值及作用，卻不應遭到忽視，對理解馬克思主義在香港的傳播與發展，更是重要。

參考資料

- 本刊記者，2011，〈紅衛兵逃港與《北斗》雜誌〉，《開放雜誌》2月號。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1102p46.html
- 劉山青，1992，《無悔的征程》，香港：明報出版社。
- 雙山，1966，〈與友人書〉（該文後來收錄在1974年出版的文集《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ia-chinese-wong-1966.htm>
- 汪岷，2012，〈回憶王炳章和早期《中國之春》〉，《世界民意網》。<http://www.wpoforum.com/viewtopic.php?fid=1&tid=52629>
- 吳仲賢，1997，《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
-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1982，《民主中華：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 學苑編委，1975，〈訪問紅衛兵吳甦〉，《學苑》，第15期（74/75），頁10-11。

今期供稿人簡介

區龍宇：

退休教師，工運研究者，美國學術雜誌 "Working USA" 編委會成員。

劉榮錦：

現為公開大學人文社科院教授，辦公室門貼上favourite quote：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獨立媒體（香港）創辦人之一。研究課題包括文化保育政策、社會運動、新媒體及公民社會。